

从人民公社到资本主义—中国农民如何失去集体农业和成为城市贫民

内容

前言 | 7

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 11

2—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变革 | 19

3—农业生产力和非集体化 | 39

4—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 57

5—农村集体的成就、矛盾和消亡 | 79

后记 | 109

附录 1 | 115

附录 2 | 119

参考书目 | 121

注释 | 133

索引 | 149

前言

我第一次接触到集体化和去集体化的历史是在高中。我的历史书批评了集体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去集体化。插图上去集体化的农民正在欢快地翩翩起舞。我记得，我在课本上找到的叙述和插图很有说

服力。毕竟，幸亏去集体化，我们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了吧？后来我大学主修经济学，通过提供一些专业术语强化了这一信念。我相信毛泽东时期是一场不幸的灾难，而且由于在集体或者其他公有企业缺乏个人激励，当时的人很懒惰。所以去集体化和中国所有随后的私有化改革一定做得很好，实现了为劳动人民服务。

直到后来，当我有机会和在农场度过一生的亲朋好友聊天时，我开始怀疑这种观点。他们似乎都不热衷于去集体化。当我问他们，“你们在集体下偷懒了吗？”他们总是说：“没有，我们从早干到晚。”我也注意到了，在我的农村老家，所有主要的基础设施都是在毛泽东时期修建的，包括巨大的水坝和大桥。相比之下，在后毛泽东时代，从未进行过此类项目。我清楚地看到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正在扩大。村庄正在失去活力，农民显然做得不好。我对去集体化和其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乐观态度逐渐破灭了。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美国攻读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我开始阅读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以及其他许多中国的激进著作。我并不孤单。不少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生对从革命的视角研究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很感兴趣。我们每周都有基于广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切讨论。另一位研究生彭兆昌（音译）向我介绍了几本威廉·韩丁的书，包括《翻身》、《深翻》和《大逆转》。这些书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激励我研究中国农业变化的戏剧性历史。

在那些讨论中，我决定写一篇关于中国农业变革的论文，相信将

会有助于为更好的社会奋斗。在中国，去集体化的叙述被用作捍卫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强大意识形态武器。一旦社会主义和农业集体化的议题被提及，有些人干脆说：“我们试过了，但它失败了。这就是为啥我们要去集体化。”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必要揭穿围绕集体化和去集体化的神话，然后才能传达他们新社会的激进愿景。我希望这本书能有助于那些争论和斗争。

许多人在我创作这本基于我博士论文的书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David Kotz, Mwangi wa Githinji, Deepankar Basu, and Sigrid Schmalzer 是我论文委员会的成员，在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给予了我很多评论和建议。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也受益于 Ying Chen, Zhongjin Li, Shuang Wu, Kai Yu, Zixu Liu, Li Gu, Zhaochang Peng, Minqi Li, Hao Qi, An Li, Zoe Sherman, Chen Zhang, Rod Green 和我的父母。我还要感谢我在中国和美国的所有学生和同事，多年来，他们提供了我很多反馈。许多家乡的亲朋好友慷慨地帮助我进行实地考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要感谢 Michael Yates and Martha Cameron 的精心编辑。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以文章形式出现在一些期刊上。第二章是基于 "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变革", 《科学与社会》第 78 期 (2014)。181.第三章是基于 "中国农业奇迹再探讨", 《经济与政治周刊》第 47 期 (2012) 。51-58.第四章基于 "中国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每月评论》第 65 期 (2013 年) : 51-58。(2013):17.第五章基于 "中国松滋市农村集体的成就、矛盾和消亡", 《发展与变革》第 46 期 (2015) 。

339-365.我要感谢这些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商，他们允许我在此发表略经修改的论文版本。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七十年的历史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三十年，共和国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正如中国格言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没有永恒的思想、权力和社会关系。这两个时代的天壤之别，中国人很清楚。在 1949 年，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如今，民谣哀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关系每一方面的特征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一切都出现了大逆转。红色变成黑色，高贵变成粗俗——革命变成了反动。

这本书调查了其中一些变化，因为它们影响了土地利用和农业。在 195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再分配计划。由此产生的集体和人民公社运行了二十多年并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数亿人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在 1980 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取消了以前的大部分改革并去除了集体化，把他们变回了原子化的农户，而仅在纸面上保持集体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学术界和主流媒体开始谴责农业集体化，赞美后集体化的小生产农业——通常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

responsibility system) ，或简称 HRS—作为集体农场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替代品。然而 HRS 的表现充其量只是平庸，去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明显恶化。1980 年代以来农业生产的增长已相当有限，城乡间的经济差距较之前三十年大大加剧。最近的证据还表明，随着中共本身的公开支持，土地整合和资本主义养殖场迅速发展。¹

中国的农业关系似乎在短短几十年里兜了个圈回到原地。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什么历史力量在经历了二十年的集体活动后，导致了迅速地去集体化，并逐步走向资本主义农业？

一个简单寻常的解释是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国的农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及其各自盟友的个人信念和胜利的产物。² 这些研究正确指出中共政治与土地变革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他们倾向于完全关注个别政治人物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斗争，这经常导致研究囿于宫廷阴谋的窠臼。

多数现有研究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农业的系统性变化，含蓄地假设着一种中国例外论。如此狭隘的关注点削弱了我们了解这些变化的重要性。本书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将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农业变化置于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系统性变化的背景下。分析历史背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相反，它表明当各国面临同样的农业问题和制约因素时，他们选择的解决方案表明了某些一般模式。

正如第二章所述，中国最近的趋势或多或少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20 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标志是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驱动力有

双重：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始于 1910 年的墨西哥革命和 1917 年俄国革命，以及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是以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浪潮为特征，有时被称作新自由主义。农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反映了这些变化：在第一阶段，他们倾向于以农民为中心，但在第二阶段，存在于许多国家的农资妥协都走到了尽头。以前采取渐进式土地改革的所有国家都后退，撤销了这些改革的一小部分或大部分。

20 世纪存在过几种不同的解决农业社会关系组织的方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显而易见的，但民粹主义的小生产者途径也很重要。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开始通过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农业问题。它们中的大多数至少试图保障农民获得土地，并且实行了土地再分配改革，甚至鼓励集体化建设社会主义。然而，这些国家开始转向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框架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实际上，中共内部对农业问题的回答大相径庭。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发生了对农业问题的三次论战。第一次论战是在社会主义方案和资本主义方案之间，而第二次论战是在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小生产者路径之间。最后，第三次是支持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道路的派别联手反对中共的社会主义派。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反社会主义联盟一直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所有毛的干预和他的个人感召力与权威在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毛去世后，反社会主义联盟不再面

临政治障碍。他们很快上台并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土地政策。近几十年来，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和学术的主流界已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从议程中剔除。如今，新自由主义纲领（右）和本质主义民粹主义纲领（左）占据了政治舞台。

基于类的分析（class-based）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为了解农村的历史变迁，主流提供了一个成熟且极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围绕两个关键概念：效率和自发性。首先，文献认为，中国农村集体经营效率低下，去集体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³1959-1961年的饥荒有时被认为是去集体化的重要因素。⁴其次，因为对农村政权不满，农民自发组织并集体废除了旧体系。⁵这种叙述非常符合霸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强调“个人选择”与自发秩序和经济效率之间的神圣联系。它已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石。

然而，我自己的研究表明，这些故事往往不可靠且具误导性。关于效率问题，我们以粮食生产为例。1956年至1980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2.79%，这是集体时期；但在1984年至2008年间，在后集体时期，它仅增长了1.09%。⁶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确实发生了饥荒；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集体效率低下。事实上，在1953年至1958年的饥荒前集体化时期，粮食产量以每年3.44%的速度增长。⁷饥荒过后，粮食生产在1965年恢复到饥荒前的水平。在1965年至1978年期间，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为3.51%。⁸饥荒发生在非集体化之前的20年，很难成为一个运作良好的体系终结的原因。

一个更细微的，通常是技术性的效率叙述强调，从集体到家庭的

转变本身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收益。也就是说，有一种因果关系在起作用。该版本最被广泛引用的来源之一是林毅夫，他是市场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后来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研究采用了省一级的长期面板数据，认为过渡时期几乎一半的产出增长源于去集体化。在第三章中，我批判性地回顾了这些文献，特别是复制了林的研究模型。在对一些简单的数据错误进行调整后，林的主要结果完全消失了；新的结果表明，去集体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后我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的遗产是过渡时期成功的最重要部分，即使在去集体化之后也对农业发展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⁹

在自发性问题上，普遍认为集体的效率低下，所以农民自己解散了自己的集体。即使抛开效率问题，这种观点也与非集体化的逻辑冲突。正如布拉莫尔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农民能按照他们所说的方式组织去集体化，那么集体农业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没必要进行去集体化了。¹⁰公平地说，这并不是要否定存在着小群体中个别的去集体化案例；然而，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大多数案例是不符合历史的。

我在第四章的研究表明，中共在推广包产到户方面是积极而非消极的。干部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必须遵循中央领导的政治方针。主流观点认为，那些反对非集体化的是害怕失去控制的地方干部。但我的研究表明，干部和一小部分农民执行并受益于非集体化，而大多数农民不甚热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反对非集体化。

基于这些证据，我认为，去集体化是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政治基础，因为他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力，而且破坏了工农联盟，大大减少

了改革的潜在阻力。农村改革对中共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这也正是主流社会把非私有化解释为自发的原因。

但是，如果去集体化不是由效率和自发性驱动的，为什么它最终会在没有重大阻力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农村集体制度的内部矛盾是什么，促进了（如果不是“导致”）其消亡？我在松滋市的田野调查（见第五章）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我发现农村集体有显著的成就。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经历过推诿（逃避工作）和效率低下，但不是因为平均主义，而是因为分层——因为干部—农民，老板—工人之间的分歧。农村集体的实际消亡主要是由于共产党的政治压力。但是，分层确实导致了农民在抵制体制改革方面的被动性。

分层是绩效不佳的根源，也是集体时代农民抱怨的焦点。相反，去集体化似乎能通过破坏整个集体，从而摧毁分层，这反过来又使原来功能失调的集体产生更好的业绩。这可能是大多数农民在没有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就接受新政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采购价格调整带来的收入增加，可能也有助于农民对新政策的信心。当然，其他的因素，如干部的宣传工作，也不容忽视。

但是，非集体化是解决分层的真正办法吗？从逻辑上讲，分层并不是集体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集体的社会主义因素对分层有一定的限制，至少在收入分配方面如此，但一旦它被废除，就没有这样的限制了；去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权力，并允许更大、更明确的分层，最终导致了阶级分化。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本书为分析中国农村从公社到资本主义的戏

剧性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异框架。我希望这一讨论将会对任何愿意从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中学习、为结束我们称之为史前历史所努力的人都有益。

第二章

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并存的时代。本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社会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 1917 年苏联成立后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二战后爆发的民族独立运动推动的。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是以世界范围内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浪潮，有时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这个戏剧性的周期塑造了当代世界社会关系的许多关键方面，尤其是土地变革的轨迹。

二战后，许多国家实施了土地改革，试图在不同程度上保护农民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侵害。这些政策的一个关键要素是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在一些地方——例如韩国和台湾——实施了“耕者有其田”。土地再分配得到较好执行，大部分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在其他国家，像秘鲁和智利，土地甚至被集体化了。像埃及这样的国家，虽然没有重大的土地改革，但至少试图对土地资金设置上限，并对个人土地所有权的规模加以限制。在中国和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改革包括集体化——农民集体拥有土地——一部分是为了防止新农民中潜在的阶级分化。

这一时期被称为“土地改革的黄金时代”。¹ 这些土地改革在规模和内容上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改革者的目标是抨击前资本主义，主要是封建或殖民地的关系。这通常被称作“现代化。”在多数国家，农民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作改革的盟友，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内部条件，而封建领主或其他传统的特权群体则是目标。换言之，有史以来第一次，资产阶级各派系在世界范围内与农民妥协。

请记住，这种妥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它和任何社会形态一样充满了矛盾，并处于变化之中。例如，资产阶级在东亚国家鼓励以牺牲地主为代价和农民妥协，同时又迅速粉碎了雅各布·阿本斯（Jacobo Arbenz）在危地马拉实施的进步改革。国际上联合的资产阶级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并迅速取消了之前的大部分土地改革。同时，他们还发起了进步联盟，鼓励拉美国家进行土地改革。资产阶级只有在感觉需要时才退出妥协，但总的来说，他们保持了妥协，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从中受益。

同时，许多国家的土地改革往往受到限制，部分原因在于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自耕农往往反对革命。例如，在1960年代初期的秘鲁，富有的佃户在土改后变得反动；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些国家。² 具体的因素，如国家的形式，也很重要。例如，在印度，尽管国家试图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但国家的民主形式和社会的阶级联盟限制了土改的有效性。³

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首先造成了资本家—农民的妥协。政治力量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阶级动态。在内部，农民通常是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土改的要求是独立或革命动员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独立国

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²外部压力也很关键，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那儿的土改主要来自上层。³

鉴于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榜样，农民受到了国内共产主义者的鼓舞乃至动员。如果国内的资产阶级不能进行改革以安抚农民，那么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就会进行干预。这就是发生在台湾的情况。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榜样，美国和台湾政府联合进行土改。

经济因素在农民与资本家的妥协中也发挥了作用。首先，改革前的农业是低效的，所以土地关系的变革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增长率，使国家自给自足。拉美的庄园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地方，一些地主已经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效率因素就不是那么重要了。⁴其次，有人认为更平等的土地分配会增加国内的需求；这显然符合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工业化目标。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化的经济论点也是类似的：集体化将产生更高的增长率，这将促进工业化；从长远来看，更好的工业支持将使农业受益。

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各国的运作方式并不固定，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而言，渐进式的土地改革是必然的，而不是选择。讽刺的是，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后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的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口号，当时被列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一揽子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成分。然而，资本主义与农民的妥协在 1970 年代走到了尽头。如表 2.1 所示，所有采取渐进式土地改革的国家都退后了，取消了之前改革的一小部分或大部分。在

1992年，墨西哥是土地改革的先驱，他修改了1917年的宪法，允许土地出售。⁵1994年，古巴作为残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了私人农业市场并将国有农场划分为较小的合作单位。⁶1983年，在1974年实行了被称为“乌贾马”（Ujamaa）的激进集体化的坦桑尼亚公布了新的国家农业政策，以鼓励商业化农业与土地合并。⁷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消亡和迅速的私有化，使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进入了应该新阶段。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随后在俄罗斯和东欧出现的快速私有化，无需赘言。

值得分析的是，这一时期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因素可以分为两组，内部和外部。在内部，随着独立革命的消逝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加强，在世界范围内，整个资本主义的秩序得以生存，并或多或少地稳定下来。台湾和韩国都是如此，它们都获得了快速增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精英们逐渐变得更加亲近资本主义。⁸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都喜欢非政治化的农民。这就为打破以前的妥协奠定了基础。

从外部来看，曾经强大的共产主义威胁已不复存在；中苏论战，中美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合作，以及苏联最终的消亡，都极大破坏了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先前保持妥协的必要性，并很快开始反击。这在意识形态上体现在学术界——例如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主义的崛起，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实体的政策中。如果有必要，它也会在军事上得到执行，例如在智利的政变中。

...the urban gentry, undermined the socialist movement. The
 italist class was largely relieved of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the pre-
 as compromise and soon began to fight back. This was manifested

Chinese Agrarian Change in World-Historical Context

2

TABLE 2.1: Agrarian Changes: Selected Countries

Country	Phase 1	Phase 2	Notes
Algeria	1962	1981	The state sold all its estates inherited from French colonizers; state farms were privatized in 1987.
Chile	1967	1973	Pinochet's military government returned 30% of expropriated land to former owners; 20% was sold.
Cuba	1959	1994	Introduced private agricultural markets; state farms were divided into smaller units.
E. Central Europe	1940s, 1950s	1989	Massive privatization.
Egypt	1952	1992	Secured tenure revoked.
El Salvador	1980	1992	Land titling and parcelization of cooperatives.
Ethiopia	1975	1991	Secured private investors' rights to the use of land.
Iraq	1958	1987	Privatization by leasing or selling state farms to the private sector.
Mexico	1915	1992	Individual titling and freedom to sell land.
Nicaragua	1979	1990	Land titling and privatization of state farms; restitution of lands that had been illegally expropriated.
Peru	1969	1980	Parcelization of cooperatives.
Soviet Union	1920s	1989	Massive privatization.
Syria	1958	1990s	De facto privatization by provisioning tracts of state-owned land to agricultural companies.
Tanzania	1975	1983	Encourage commercial farming and land consolidation.
Vietnam	1940s	1980s	Decollectivization and free market.

Sources: El-Ghonemy, 1999; Kay, 1998; Mathijs and Swinnen, 1998; Metz, 1988; Daley, 2005; Barraclough, 1991; de Janvry, Sadoulet, and Wolford, 1998; Bush, 2007; Akram-Lodhi and Haroon, 2007; wa Githinji and Mersha, 2007; Hinnebusch, 1995.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土地改革未能实现改革者曾经期望的高增长率。拉美政府未能向农业提供财政、技术和其他支持。⁹相反，工业积累往往对内部贸易条件（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在集体化过程中，领导层缺乏经验，计划不完善的情况很普遍。在极端情况下，如苏联，粮食产量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可靠地超过革命前的水平。¹⁰ 统治阶级很快得出结论，改革的成效不够。第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加息后爆发了债务危机，这使得债务累累的国家政府无法为农业提供资金。¹¹ 第三，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所谓绿色革命以高产品种和化肥为标志，似乎有一种技术手段可以替代体制改革。最后，全球农业综合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农业综合企业直接要求扭转土地政策（如危地马拉）。另一方面，1970 年代以后，农业综合企业和全球化粮食市场空前发展，这意味着国家的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和外国投资来规避粮食充足和国家工业化问题，这使得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被进一步边缘化。¹²

条件的逐渐变化导致了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固有矛盾的加剧。农民保持沉默和非政治化，而资产阶级则变得咄咄逼人。资本家和农民的妥协变得不可妥协，这导致了二十世纪后期的反革命。

土地问题与中国

土地问题指的是将前资本主义农场转变生产性的“现代”农村：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国家工业化创造剩余；以及农民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这种转变是以不同方式完

成的。对于农村小生产者普遍存在的国家来说，有三种可能的方向。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模式试图通过发展有差异的农户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导向的模式通过组织小农户发展集体生产。民粹主义模式试图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户免受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影响，但不发展集体。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同意废除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关系，但在这个历史性的结合点之后，它们出现了分歧。资本主义道路意味着资本主义农场和农场雇佣劳动的发展，而社会主义道路则意味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相当程度的公有制；古典意味上的民粹主义者同时拒绝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设想。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革命阶段开始通过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土地问题。其中大多数国家至少试图保障农民获得土地，许多国家进行了重新分配的土地改革，甚至鼓励集体化，以建设社会主义。然而，这些国家在第二阶段开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以前的小生产国，如埃及取消了对农民的保护；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出现了资本主义农业。

这对中国的农业变革有什么启示？很明显，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土地关系的变化反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历史。中国在第一阶段进行了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在第二阶段解散了集体。虽然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仍被保留，但中国通过非集体化重建了小生产者农业。农场经济逐渐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而且有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的明显趋势。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当中共在 1920 年代第一次开始革命时，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

国家，其特点是生产力低下，土地分配高度不均。人们普遍认为 20% 的人口拥有 60% 以上的土地。农民年产量的 50% 到 70% 作为地租交给了地主。与同龄人不同，毛泽东没有把农民看成是被动的——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巨大革命浪潮的可能性。他说服了同志们相信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最终，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共取得了政权。革命之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拥有者。然而，小块土地和仍然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关系，不仅只能勉强供农民养家糊口，而且导致了由于疾病、自然灾害和其他中国农业普遍落后的固有冲击，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或最终深陷债务之中。

中国领导人同意消除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必要性，但他们对未来的最近解决方案有分歧。当时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主张采取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刘少奇曾经说过，小型合作社不可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集体，而且合作社的衰落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以依靠自己了。刘少奇甚至引用了圣西门的例子来论证，一个人在成为资本家的同时，仍然可以是个社会主义者。

20 世纪 50 年代初，集体化还没被提上日程，但是有些地方的农民自发组织起了小型合作社。山西省的领导人向刘少奇汇报，建议进一步动员组织集体，否则富农和剥削会死灰复燃。

然而，刘少奇极其反对在没有强大的国家工业基础和机械化的前提下集体化的想法，他称之为“危险的、空想的”。他甚至解释了自己对农村发展的看法：“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民中新富的部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领导人更倾向于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时任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部的部长邓子恢是这一派别中直言不讳的成员之一。邓子恢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持悲观态度，认为农民更喜欢家庭耕作而不是集体劳动。他显然不同意资本主义解决方案，但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和经验，他对社会主义方案持怀疑态度。

1955年春天，中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尖锐。一些农民甚至批评说：“共产党比国民党（Nationalists）还坏。”这种态度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新的集体在没有充分动员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起来，中农担心他们宝贵的生产资料被公有。二是国家粮食收购额太高，农民没有多少余粮供自己消费。

邓子恢认为，虽然粮食采购的问题很大，但根本问题是集体化。于是，他在浙江省推行“收缩”政策。旨在大幅减少集体的数量和粮食采购的水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集体的数量急速下降，减少了30%。

与前两个派别不同，毛泽东和他的盟友旨在通过发展农村集体来改变土地关系。在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中，毛泽东阐述了他对集体化的论点。首先，作为对刘少奇的回应，他认为农业集体化是机械化的基础，而不是反过来的。他的理由是，经过动员和集体化的农民可以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管理自己的劳动能力，为采用新技术和作物品种创造更好的条件。集体化也会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从而增加对国家工业产品的需求。毛泽东还指出，如果再次遭受资本主义发展的痛苦，中共将失去在贫农中的政治基础。他批评了邓子恢忽视了贫农因缺乏

生产资料而怀有的强烈的集体劳动动机。没有单个农民家庭能负担得起或在经济上使用拖拉机，但集体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此外，毛泽东还批评地研究了“缺乏经验”的问题，认为农民只有通过自己动手才能获得建设集体的经验。最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苏联也对毛泽东的主张给予了重要支持。通过借鉴苏联在集体化后取得的成就，毛泽东进一步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吸取苏联领导层的错误教训，把工作做得更好。

表面上看，这些只是对农村发展顺序和速度的不同看法，但它们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刘少奇一样，许多中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集体化将在遥远的未来才到来，他们不想在感觉到它的历史必然性之前发展它。隐含的是，他们认为农村在成为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的转型。其他的人，像邓子恢，既不想搞资本主义，也不想搞社会主义，而是希望稳定小生产者的经济。

这些支持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得到了新中国精英的大力支持。1960年代初，大跃进失败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都支持去集体化。据估计，有20%的农村人口采用了私人家庭耕作的方式。

这一次，走资派和民粹派似乎携手并进。刘少奇非常悲观，他预测集体的粮食产量将长期下降。毛泽东去世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也赞成去集体化；他声称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鼓励去集体化，而集体农业“现在是退的时期。”邓小平也说出了那句名言“不管黄（在邓的引文中通常为“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换句话说，只要行得通，使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这些领导人实施的整个改革方案，

后来被称为“三自一包”，推动了私人家庭耕作。

毛泽东为农村集体组织辩护。首先，他认为，集体的粮食生产在1962年开始恢复，这比悲观的预期要早得多。其次，毛泽东指出在几个实行非集体化的贫困省份，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一些农民无立锥之地，一些农民成为高利贷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后来评论道：“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非集体化）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最后，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尽管非社会主义道路在领导层中得到了大力支持。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加上社会主义集团的直接影响），工业化的需要，以及毛泽东无可置疑的权威。一时间，似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然而，和其他国家一样，非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占了上风，中国的这句谚语被讽刺地扭曲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进一步的考虑

随着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土地问题的三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在中共内部转化为两大派别：那些想继续发展集体的人（社会主义道路）和那些想回答前集体化阶段的人（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道路的历史交叉点）。

这些解决方案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们吸引力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同阶层。一般来说，贫农和普通工人（大多数）有可能从社会主义道路受益更多，而中农和富农（潜在的资本主义农民）和官僚（潜在的资本家）可能会从其他模式中获利更多，正如后来改革部分说明的那样。

事实上，社会主义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于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和更好的肥料等技术，并通过农村的集体网络迅速传播，农业生产显著改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项目在集体中建立起来，大大改善了中国农村的整体公共卫生和文化水平。尽管现有模式存在各种问题，许多农民仍然对集体生产抱有信心。在一本广为流传的关于中国陈村历史的书中，作者采访了 1970 年代从中国大陆非法逃港的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尽管逃亡，但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农业比私人模式更好，他们中很少有人对中共抱有敌意。

然而，无论是成就还是大多数人的潜在支持，都不意味着国家一定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列宁的设想中，在社会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的分析证实了列宁的设想。“中国现在还有不平等的八级工资制，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要出资本主义很容易的。”毛泽东是正确的，在列宁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将会很小，并由武装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控制；然而，在中国（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并非如此。部分是由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拥有强大、有力和保守的官僚机构，这意味着工

农对国家的民主控制将不复存在。

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能够发展自己的利益和政治权力，并通过减少工人和农民的权力来进行自我繁殖。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由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党国精英们的个人财富和权力仍然面临着各种限制。与西方同行相比，他们的收入要低得多，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特权。

虽然不存在真正的资产阶级，但控制国家机器的集团有足够的动力成为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将主要由国家机器决定，而国家机器往往是亲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用“走资派”来形容相当一部分上层干部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七年，即1949年至1966年，这些干部与一部分精英工人和知识分子一起，逐步确立了对国家的控制。虽然毛泽东和他的盟友抵制了这种与在苏联相似的趋势，但他们并不十分成功。这构成了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只有在激进时代（1966-1976），旧的国家机器才被部分粉碎，列宁对国家机器进行民主控制的愿景才部分实现。然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成功建立起农民和工人对国家的控制，旧的国家机器在1970年代逐渐恢复。

由于在毛泽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反社会主义联盟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的干预和个人感召力及权威在中国追求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时，人们甚至认为毛泽东仅凭一己之力就推翻了官僚国家机器。

1975年的著名电影《决裂》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预言，影片讲述了

一个关于集体农业对抗个体农业的故事。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广大基层党员和多数农民的支持，但他们缺少政治权力。走资派获得了富农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中共地方干部的支持，这些干部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秘密支持。社会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岗位，甚至被捕入狱。看上去非集体化即将发生。毛主席直接进行了干预，写信表示全力支持社会主义者。最终，走资派被击败，阳光重新普照农村。然而，我们按照电影的逻辑，没有毛泽东的干预，考虑到政治结构，非集体化是不可避免的。

而这正是毛主席在 1976 年去世后发生的事情。对于反社会主义联盟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宫廷政变只是增加了一些噱头罢了，尽管他们仍花了几年时间才想出如何摧毁毛泽东的遗产。有趣的是，

《决裂》在毛去世三年后被禁，并被谴责“大毒草”。从 1980 年早期开始，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非集体化，尽管农民和地方干部强烈抵制（详见第四章）。中国农民如今被迫脱离了社会主义传统，回到了小生产者的地位。

大多数劳动人民没有立刻看到所有这些变化对他们自己的影响。但艺术家们往往察觉到了。仅仅七年后，在另一部极具影响力的电影《牧马人》中，一位贫穷的牧民与一位在毛时代当过牧民，而在后毛时代成为教师的知识分子交谈：“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现在我们这些人都完蛋了。”(You were once among us;now we folks are all done.)

故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继续

反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生代的开始，社会主义被半官方地从政治议程中剔除。如今，后毛时代的领导人一再声称中国将“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但新路是什么？

如今，随着社会主义解决方案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剩下的只有民粹主义和资本主义。在 1980 年代，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突然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会引起群众的严重怀疑，造成失地农民，并滋生政治动荡。因此，那时采用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建立稳定的小土地所有权和家庭农场，似乎更可行。去集体化运动始于 1970 年代末，尽管它伪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幌子下。但它实际上把中国农村带回到 50 年代初民粹主义和资本主义派别之间历史妥协的前集体化时期。

如果说毛时代的民粹主义阵营只是主张相对渐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那么当代的民粹主义阵营则在寻找着不同的东西。鉴于整个政治经济的变化，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现在更多与资本主义保持一致。从本质上讲，这种新民粹主义或市场民粹主义描绘了一个均质化的农民群体，他们对家族企业和市场有着强烈的偏好。

两派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在杜润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是新土地关系的设计者，当时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应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译者注）。杜润生认为，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用他的话说就是“敏感”“脆弱”和“机械化程度低”——小生产者会比集体更好地照顾农作物。杜润生声称“当今世界”已经证明，家庭农业与现代化是完美契合的。显然，这个“世界”只包括美国和西欧国家。在

晚年，杜润生承认他的想法部分来自他对美国、日本、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积极印象（这是他 1979 年后访问过的国家），特别是广泛存在的家庭农业和现代技术。

尽管小型家庭农场似乎优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农业生产，但在杜润生的论点中，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排除逐步过渡到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正如杜润生本人在同一份报告中强调的那样：“我们不想永远保持小生产；我们将向现代化大生产迈进。”

仅仅几年后，杜润生重新审视了土地变革问题，采取了更加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场。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杜润生公开批评家庭农场效率低下，并声称中国应该发展规模经济。然而，他否认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处，声称“农民不会支持集体经济”。杜氏的论点意味着只有一个选择：资本主义农场。根据他的想法，杜润生后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包括将农场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鼓励土地逐步集中，以利于新生的资本主义农民。

在非集体化运动之后不久，民粹派和走资派间的蜜月期就结束了。走资派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即“高效规模农业”），他们往往倾向于忽视小农家庭在这一过程中的痛苦和被剥夺。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政策变得更加以城市和工业为导向；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从毛时代的水平大幅下降。1999 年，一位地方干部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民粹派原则上不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影响

更为谨慎，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资本主义人性化的一面：城乡居民平等的权利，对农民的减税，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对农村的其他福利政策。民粹主义阵营的主要学者温铁军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解构”现代化的概念，以保护“不可避免”的小农农村经济。

从 1980 年代开始，这种分裂重新定义了主流政治光谱。在农村问题上，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支持者成为右翼，而民粹主义反对派——无论多么温和——则形成了左翼。有时，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甚至在反对资本主义者的政策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例如，在土地私有化问题上，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坚决捍卫集体化的最后遗产；走资派赞成农村土地完全私有化，以促进土地集中；而民粹派则赞成采取更渐进的方式，也支持维持法律意义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以保护事实上的小产权。

当代土地变革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民粹派和走资派间的动态妥协，但是后者的分量更重。自从本世纪初以来，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代表了底层的声音，成功说服中央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某些福利支持和减税。然而，代表“效率”和“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派别也在关键问题上赢得了优势。例如，2008 年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农村发展的决议，明确鼓励农民用土地所有权进行交易，以集中土地进行更大规模的高效农业生产。

尽管存在任何可能的分歧，这两个派别的共同点是否认任何社会主义农村项目。毕竟，民粹派并不真正反对市场和资本主义，而走资派也没有主张立即废除小生产者。

同样，中国在第二阶段的政治微妙性在其他国家也找到了对应和联系，虽然往往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根据布拉斯（Brass）的说法，20世纪后半叶的言论认为，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农村运动放弃了群众动员的手段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至于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实际正在进行的高度政治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农民运动，佩特拉斯（petras）和维特蒙（Veltmeyer）指出，主流要么认为近几十年的运动是前现代的，均质化的农民正在打一场败仗；要么将这些斗争视作后现代的，寻求文化和民族认同。事实上，像温铁军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把这些运动作为支持均质化的上层农民的民粹主义概念的证据。正如在中国一样，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学术主流已经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从议程上拿掉，留下的是新自由主义方案（右）和民粹主义方案（左），这两种方案占据了政治中心的舞台。请记住，这两种愿景并不互相排斥。套用布拉斯（Brass）的话说，只要为市场有效地生产农产品，新自由主义就接受小农。

如果我们考虑到农业变革的整体效果，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大背景下的与之纠缠在一起。非集体化和随之而来的变化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为城市工业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2016年农民工人数超过2.8亿）。这个庞大的后备军进一步削弱了旧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权力促进了过去二十年大规模的私有化。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农业关系的根本性逆转，世界劳动力在过去几十年有了显著扩张。在农业关系方面：通过农业综合企业在周边国家进行非农化(depeasantization) 以及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融入世界经济。

显然，全球后备军的扩张大大促进了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并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中国的农业变革一直是整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语

中国不断变化的土地关系一直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毛泽东时代，斗争主要是在亲集体（社会主义导向）派和反集体（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导向）派之间展开的。在后毛泽东时代，反集体主义阵营内部的紧张关系成为中心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中国的模式与其他国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特殊性，主要是由于毛主义的激进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中国就逐渐融入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学术工作方面。换句话说，与“中国例外论”的主流说法相反，随着中国从毛主义激进主义中解脱出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土地关系（以及整体社会关系）方面变得越来越“正常”。

随着非集体化和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目前的中国面临着两难处境：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在农民和工人中保持合法性。一方面，城市资产阶级和跨国企业的主导利益需要稳定的工人和土地供应，这意味着农村土地的进一步巩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安抚农民和工人的，保护他们免受剥削和血汗工厂的侵害。国家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是需要保证高水平的粮食供应。中国日益增

长的粮食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国际粮食市场无法满足，这导致国家在对农村推行任何巨大的变革犹豫不决。这种困境的结果还有待观察，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劳动力供应开始减少，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开始增加，或者国家无法解决工人阶级的担忧，中国可能发现自己同时陷入政治和经济危机。

未来的社会主义项目至少可以从中国的农业史中吸取两个教训。首先，如果没有工农对国家的民主控制，已经受到挑战的社会主义项目（或任何进步的项目）将更加脆弱。中国和其他许多在土地关系上走了一圈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第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项目，一路上都有矛盾和反对。当中国革命在 1949 年获得成功时，毛主席宣布“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建设社会主义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第三章 农业生产力及非集体化 介绍

中国农村集体的解体从 1979 年开始，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到 1984 年，向家庭生产系统的过渡已经牢固确立，此后一直保持稳定。尽管不同的研究呈现了不同的结果，但人们普遍认为，非集体化是中国在 80 年代初取得令人瞩目的农业成就的最重要原因。

然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非集体化后明显放缓。表 3.1 列出了三种最重要的作物（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产量增长率，这三种作物在过渡时期和家庭生产稳定期都占到了总播种面积的 80% 以上。这三种作物的平均产量增长率在 1984 年后急剧下降。因此，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家庭生产稳定时期的农业绩效与过渡时期相比处于劣势。

既然家庭生产稳定时期的表现并不突出，那么过渡时期中国农业奇迹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新考虑 80 年代初显著增长的原因。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和以往研究的批判性回顾表明，非集体化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明显，而现代投入的更密集的应用和其他外生因素，如天气，占产量增长的大部分原因。

TABLE 3.1: Household Agriculture before and after 1984

	% of total sown area			YIELD GROWTH RATE (%)		
				Transition period	Stable household	First year 1984 level achieved
	1970	1980	2008			
Grain	83.12	80.09	68.34	7.17	1.33	1987
Cotton	3.48	3.36	3.68	9.07	1.53	1997
Oil crops	3.15	5.42	8.21	13.20	2.18	1990
Total	89.75	88.87	80.23			

Sourc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2009, 17, 23, 25;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05, section 39.

过渡时期的历史概述

过渡时期是复杂的，不同的力量同时在运作。虽然不可能涵盖这一时期变化的所有方面，但这一概述提供了从天气条件到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分析。

非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 HRS

改革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和分配都是由生产队管理的，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下的基本单位。在改革初期，允许在集体中进行一些管理调整，但保留了集体框架，工作管理和收入分配仍然由集体决定。这种早期过渡性政策的流行形式之一是，小型工作被承包给具有特定技能的工作组或个人。但事实上，小工承包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它在集体时代就已经实行了。然而，在新的制度下，使用了更多的经济激励措施。这就是为什么这项政策被称为“责任制” (responsibility system)，或者更准确地说，“联产责任制”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基于绩效的报酬和责任制—译者注)

与 1980—1981 年的非集体化改革相比, 早期的集体制度改革被证明是次要的, 当时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分割给农村家庭, 生产、分配和相关业务完全由个体家庭控制。¹ 这一新政策基本上解散了集体, 从 1984 年起, 个体户成为新生产系统的基础。这种非集体化改革被形象地称为“大包干” (divide-all-up: 分而治之), 但后来改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household contract and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或简称为责任制 (HRS)。如表 3.2 第一栏所示 (见 43 页), HRS 扩展非常迅速: 1980 年, 只有 14% 的生产队采用 HRS; 两年后, 80% 的生产队采用了 HRS。

技术扩散和生产条件

过渡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使用化学投入。自 1970 年代以来, 包括在集体制度的最后几年, 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 化学肥料的使用量稳步上升。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过渡时期, 在这一时期, 化肥的使用量在五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表 3.2, 专栏 2)。此外, 有人指出, 中国的农业系统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严重缺氮。过渡时期的肥料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因为中央政府在 1973—1974 年 (集体时代) 进口的大型合成氨尿素复合肥在 1970 年代末投产。²

中国的绿色革命是在集体主义时代开始的, 并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一个“高度发达、基础广泛和成熟”³ 的全国性的农业研究系统。

改良种子 (高产品种) 的推广对中国农业的增长特别重要; 早在 1959

年，中国 80%的播种面积都是改良品种，但在整个集体时代，种子都在不断改良。⁴例如，杂交水稻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发的，但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确实恰与非集体化同步（表 3.2，第 3 栏）。此外，鉴于集体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修建了大量的水库和其他农村基础设施，过渡时期的化肥供应量和质量的急剧提高使杂交品种的优势更为明显。⁵

1970 年至 1978 年期间，由于集体时期的国家机械化目标，农业机械的使用增加了 400%以上（见表 3.2，第 4 栏）。1978 年至 1987 年期间，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但增长率较为平缓，每年 8%。过渡时期和之后的相对下降不仅是由于国家对农业机械化缺乏支持。这也是 HRS 的自然结果：个体户没有动力在他们狭小、分散的土地上使用大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农业产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天气。在集体时代，农村社区能够修建许多水库和水坝，以减少恶劣天气的影响。然而，天气变化确实对农业绩效有影响，特别是在短期内。表 3.2 第 5 栏列出了衡量 1970 年至 1987 年天气波动的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与长期平均数的偏差。因此，数字越大代表天气比平均水平差，数字越小代表天气越好。计算结果表明，1970 年至 1975 年，天气状况普遍较好；这一时期之后是五年的恶劣天气。1980-1984 年期间，自然灾害变得相对较小且不那么频繁；1985 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天气再次恶化。最后，表 3.2 第 6 栏列出了一个常用的衡量相对劳动强度的指标，即“复种指数”（MCI）。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总播种面积除以总耕地面积，它反映

了单位农田上花费的相对劳动的变化。在集体时代，这个指数一直在变化，因为灌溉和机械化的增加使集体耕作更加集约化。⁶据许多 HRS 的辩护者说，农民在集体结构下没有那么努力工作，因为很难监督他们的努力。然而，复种指数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劳动强度在过渡时期有所下降，尽管在 1985 年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⁷

TABLE 3.2: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1970–1987

Year	HRS Adoption [1]	Use of Fertilizer [2]	Hybrid Rice Diffusion [3]	Machine Power [4]	Weather [5]	MCI [6]
1970	0	3,512		21,653	-73.72	141.9
1971	0	3,647		n.a.	-29.41	144.7
1972	0	4,207		n.a.	21.67	147
1973	0	5,111		47,829	-21.53	148.2
1974	0	4,858		59,303	-23.01	148.7
1975	0	5,369		74,786	-12.62	150
1976	0	5,828	0.4	86,296	1.55	150.6
1977	0	6,480	6.2	102,617	28.89	150.5
1978	0	8,840	12.6	117,499	53.61	151
1979	0.01	10,863	15.4	133,795	12.02	149.2
1980	0.14	12,694	14.2	147,457	47.4	147.4
1981	0.45	13,349	15.4	156,801	26.91	146.6
1982	0.80	15,134	16.8	166,142	7.74	146.7
1983	0.98	16,598	20.3	180,219	10.17	146.4
1984	0.99	17,398	26.7	194,972	2.69	146.9
1985	0.99	17,758	26.4	209,125	47.18	148.4
1986	0.99	19,306	28.3	229,500	54.346	150
1987	0.99	19,993	33.0	248,360	34.63	151.3

Notes: HRS adoption measures the year-end percentage of production teams that adopted the HRS. Chemical fertilizer is in thousand tonnes. Hybrid rice diffusion measures the percentage of total rice fields planted with hybrid seeds. Machine power is in thousand kilowatts. The weather index is a constant weighted sum of Shouzai and Chengzai areas. The weather variable presented here is the yearly percentage deviation of each year's index from 1952 to 1984 mean; more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Kueh's book.

Sources: Cols. 1 and 6: Lin, 1992. Cols. 2 and 4: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05, section 38. Col. 3: Stone, 1988. Col. 5: Kueh, 1995; the 1985–1987 index is calculated based on Kueh's method.

采购调整

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采取了一项名为“统购统销”（unified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的政策。这意味着政府在农产品的收购和定价方面拥有一定的垄断权。所有农产品被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战略物资，如谷物、油料作物和棉花。这类商品由政府按一定的收购价格强制采购。1972 年，对超过配额的产出实行 20% 至 30% 的价格溢价。剩余产品可以按协商的价格出售，这个价格高于绝大多数配额以

上的价格。⁸

从 1979 年开始，第一类产品以及烟草、活猪和糖类作物的采购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例如，粮食的采购价格增加了 20%，超过配额的价格溢价从 30% 增加到 50%。⁹ 某些农作物的价格进一步提高。同时，强制配额逐渐减少；这不断提高了平均价格和利润率（见表 3.3，第 1 栏）

关于这些采购调整，需要牢记两点。首先，如果不考虑配额减少对加权价格的影响，在 1983 年和 1984 年的丰收期间，价格似乎停滞不前；事实上，利润率在 1984 年之前一直在增加。（表 3.3 第 3 栏列出了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利润率）。第二，工业投入的价格也在增加；因此，表 3.3 第 3 栏，高于配额的价格与工业投入价格的比率，提供了一个更平衡的情况。

一些研究者还强调了过渡时期重建的农村市场的功能；但是，从市场上出售的谷物比例（表 3.3 第 4 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市场化对农业的总体影响可以说是很小。因此，本研究中不考虑农村市场化的影响。

不难理解价格上涨对农民积极性的影响；但是，价格上涨的确切程度却很难衡量，因为这一时期有全国性的销售计划，对超过定额的交付给予额外的粮食或肥料，更不用说各地类似的地方计划。¹⁰

TABLE 3.3: Procurement Adjustment: 1978–1987

Year	Grain in Quota Sales (%) [1]	Main Grain Crops, Net Revenue [2]	Ratio of Above-Quota Price to Industrial Input Price Index [3]	Grain Sold on Market (%) [4]
1978	75	0.25	100.0	0
1979	58	2.81	140.4	7
1980	56	2.77	139.2	7
1981	44	3.05	142.3	7
1982	38	3.74	139.3	8
1983	29	4.35	138.6	5
1984	26	7.11	132.1	9
1985	73	7.19	116.2	16
1986	55	8.97	113.3	17
1987	44	7.92	108.1	21

Note: The main grain crops include cereal, wheat, and corn; this net revenue measures the after-tax profits from 50 kilograms of grain output on average.

Sources: Cols. 1 and 4: Aubert, 1990. Col. 2: Stat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ttee, 2003. Col. 3: Lin, 1992

对 HRS 影响的批判性评估

大多数文献都对非集体化和 HRS (这两个词在本研究中可以互换使用) 抱有坚定的信心。然而，一些更详细、更务实的客观研究对 HRS 的优点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支持非集体化的研究中，林毅夫的著作被最广泛地引用，特别是在政府文件中，尽管它偶尔会被匿名称为“一些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林毅夫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评估。

支持 HRS 的研究

在这一类别中，主要有两类研究。第一种是关注中国农业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 (TEP)。大多数研究表明，TEP 在过渡时期有所提高。尽管有些研究承认，一旦 HRS 完全建立并稳定，也就是 1985 年以后，

TEP 就会下降。¹¹

有许多方法可以构建 TEP（或其增长率）。例如，TEP 的增长率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增长核算方法来计算，即从产出增长率中提取某些关键投入的增长率的加权和。TEP 也可以简单地通过用产出除以投入的加权和来生成。在一些研究中，TEP 指数的计算采用了更复杂的方法，如 Divisia 指数和 TörnqvistTheil 指数。从本质上讲，TEP 指数的构建试图从产出增长中消除投入的贡献，以获得不能由所有传统投入直接解释的部分。

撇开 TEP 在就业不足的农业背景下的使用问题不谈（没有精确的劳动力投入数据），这些研究都没有就 HRS 的作用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首先，他们的研究表明，与集体时代相比，过渡时期的 TEP（或全要素生产增长率）普遍较高。他们没有分析采用 HRS 和生产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或明或暗——或匆匆地得出了 HRS 优越的结论，甚至没有询问 HRS 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正如上一节所显示的，在过渡时期有许多不同的力量在运作；因此，这些研究未能为 HRS 的优越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其次，在所有这些研究中，TEP 的数字在 1984 年稳定的 HRS 时期趋于下降。然而这些研究未能形成一个一致的框架来解释这种下降。例如，一些学者试图论证 1984 年后实际采购价格的下降部分解释了产量的下降，但他们从未提到过渡时期价格上涨的作用，根据他们的逻辑，这将解释当时较高的 TEP，而不一定是 HRS 系统的原因。¹²

第二类支持非集体化的研究直接解决了过渡时期采用 HRS 的作

用问题。¹³ 这些研究试图将 HRS 的影响与其他可能的因素区分开来；然而，它们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McMillan, Whalley, and Zhu 的研究是典型的。这些作者认为，1978 年到 1984 年间，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 22% 是由于价格的提高，78% 是由于激励机制（HRS）的变化。¹⁴ 首先，作者假设 HRS 改革是在 1978 年后立刻一致进行的，而实际上，政治斗争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改革（如表 3.2 所示），而且 HRS 的采用因地区而异（作者在论文中确实承认了这一点），因此，1978 年后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简单地归功于 HRS。第二，作者假设在改革期间没有发生技术进步，这是不正确的。¹⁵ 如上所述，在这一时期有几个重要的技术变革（使用杂交种、更好的肥料），这是集体时代努力的结果。不用说，结果还取决于他们的模型设置，这给他们的结果增加了另一个层面的不确定性。同样，作为一般性评论，这些研究未能为 HRS 的优越性提供证据。

务实的研究

有一些务实的研究试图驳斥 HRS 优于集体农业的观点。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了 HRS 的一般影响。Carolus 在她 1992 年的论文中总结说，如果接受最合理的投入、作物组合和特定年份的因素，采用 HRS 对作物总价值的增加不超过 20%。她还指出，HRS 的影响因预先存在的条件而异。但是 Carolus 的工作涵盖了非常广泛的 HRS 影响，所以它不能对 HRS 进行明确的整体评估。¹⁶ 另一方面，Riskin 认为，报告中产量增加的一部分是在非集体化之前已存在，但被掩盖的产量。

¹⁷Bramall 怀疑 TEP 计算的基本有效性，因为缺乏对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有机肥料和草畜的确切数量的了解。¹⁸

其他研究者对 HRS 进行了有趣的案例研究。韩东屏指出，山东省即墨县在集体化时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在实施非集体化后，机械化程度立即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农民拆除了拖拉机并分割了金属），灌溉也成了一个大问题。¹⁹Bramall 对四川省的县级数据进行了仔细研究。四川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土地改革的示范省。他发现，那些没有被非集体化的县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已经非集体化的县差。²⁰此外，在最终实施 HRS 之后，那些采用 HRS 的县并没有出现产量激增的情况；相反，大多数县的产量都出现了下降。普特曼还发现，在河北省大河县，粮食产量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升，但在过渡时期却停滞不前。²¹对长江三角洲的详细历史研究强调，非集体化并没有导致生产力的提高。²²

正如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某些地方向 HRS 的过渡并不一定导致生产力的增长；这一证据加强了人们对非集体化作用的怀疑。但其中大多数没有对全国范围内的过渡进行全面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章下面试图做的。

复制林毅夫的研究

林毅夫是关于 HRS 影响的最成熟的研究者之一。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一半的产出增长是由于 HRS 改革造成的。²³1970-1987 年的详细数据，使他能够形成一个面板数据（随

时间推移重复省级观察)，这是一个比简单地看全国生产总量更有成效的方法。²⁴利用林的原始数据集，我们在附录 1 中复制了林的模型，并在表 3.4 中列出了主要结果。（见第 50 页）。

林的模型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HRS 对作物产值的积极影响。他接着说，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看，HRS 可以占到农业生产力提高的 40% 以上。

然而，林的方法似乎在几个方面存在问题。正如 Carolus 所认为的，使用一个单一的理论 and 模型来应用于全国性的数据，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每个地方在非集体化之前的体制有很大的差异。Carolus 还批评了 Lin 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数据：由于无法获得作物部门的确切劳动力投入，因此将作物部门的劳动力在农村总劳动力中的份额和产出在农业总产出中的份额视为相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偏差。

TABLE 3.4: Estimated Impacts of HRS

	Lin (1992) Replicated		Adjusted Models	
	[1]	[2]	[3]	[4]
HRS adoption (%)	.19	.15	.06	.06
(HRS)	(.03)	(.05)	(.05)	(.05)
Land	.65	.58	.69	.69
(Land)	(.06)	(.07)	(.07)	(.07)
Machine & animal power	.04	.10	.13	.13
(Power)	(.04)	(.04)	(.05)	(.05)
Labor	.14	.15	.13	.13
(Labor)	(.02)	(.03)	(.03)	(.03)
Fertilizer	.18	.17	.15	.15
(Fert)	(.02)	(.02)	(.02)	(.02)
Nongrain crops (%)	.67	.78	.85	.85
(Ngca)	(.23)	(.22)	(.23)	(.23)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20	.20	.25	.24
(MCI)	(.08)	(.08)	(.09)	(.09)
Market price/ input price at time t-1	.02			
(MPt-1)	(.05)			
Procurement price at time t	-.03			
(GPt)	(.02)			
Weather				.001
(W)				(.001)
Time trend (T)	Yes	No	No	No
Province dummies	Yes	Yes	Yes	Yes
Year dummies	No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76	476	420	420
R squared	87%	89%	89%	89%

Notes: Numbers in parentheses are standard errors; the coefficients of province dummies and year dummies are not reported. In all column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log (value of output per team).

在承认类似的应用计量经济学工作所涉及的方法有问题的同时，我们仍然试图把重点放在林的方法的问题上。在林的实证分析中，有

几个关键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 HRS 适应率的不正确使用。正如林解释的那样，HRS 变量是指某年年底的 HRS 适应率。众所周知，农业生产通常是在某些季节集中进行的。因此，如果 HRS 的采用发生在这些季节之后——例如，在深秋和冬季——它不可能对该年的生产力产生任何影响；它只会影响下一年的生产。幸运的是，有一些关于中国非集体化步伐的零星证据，可以进行一些初步观察。表 3.5（见下文）列出了其他学者的一些估计。很明显，1981 年下半年发生了向 HRS 的大转变——从 6 月的 11.3% 到 10 月的 38%。HRS 适应率的另一次大跃进发生在 1981 年 10 月和 1982 年 6 月之间，但这些变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发生在 1981 年底。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是黑龙江省，它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区之一。黑龙江省的 HRS 百分比在 1982 年 5 月仅为 8.7%；然而，它在 1983 年 2 月迅速上升到 73%。²⁵ 因此，使用年末的 HRS 会把很大一部分生产收益归功于 HRS，而功劳实际上属于其他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价格指数的构建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农民的实际盈利能力的变化和激励的变化（如表 3.3 所示）。从 1981 年到 1984 年，相对于工业投入价格，高于配额的价格指数下降了，而实际上利润率上升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格在林毅夫的结果中只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的部分原因，这与理论和常识相悖。

第三个问题是，一些重要的信息——例如天气变化——没有被包括在内。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过渡时期的天气状况较好。这种有利的天气变化有可能促进了生产。林的论文中没有明确进行这样的实验。

尽管双向固定效应（控制特定省份和特定时间的因素）模型可能能够捕获天气变化。

TABLE 3.5: Pace of HRS Nationally

1980/01	1980/12	1981/06	1981/10	1982/06	1982/12	1983/12
0.02	5	11.3	38	67	70	94

Note: The numbers refer to the percentage of production teams that adopted HRS model.

Source: Wang and Zhou, 1985, 46; Bramall, 2000, 328.

鉴于这些批评，我们在对 HRS 的时间以及其他问题进行调整后，对 HRS 的作用进行了测试。主要的结果见表 3.4 的第 3 和第 4 栏。附录 1 介绍了方法和模型的一些细节。复制结果表明，在使用 HRS 的一年滞后值后，HRS 的强烈影响完全消失了。与林的结果相比，这些模型还产生了高度一致的其他重要系数的估计值。

根据复制的结果，产出的变化似乎主要由投入使用的变化以及种植模式、种植强度和其他特定年份的因素如价格调整和天气变化决定。最重要的发现是，HRS 改革对产出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

关于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虽然 HRS 没有直接对生产力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但它可能对主要投入的使用产生一些无法察觉到的影响，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产出。下面提出一些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投入的变化，模型中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对产出的变化有所贡献。但这些因素在过渡期内的变化很小。例如，1980-1984 年期间 MCI 下降了 0.3%（见表 3.2）。此外，很难将它们的影响单列出来；例如，

有利的天气影响与其他可能的特定年份的因素（如价格变化）一起被年度虚拟变量所捕获。然而，有充分的理由不必担心这些。首先，天气和价格变化不是由于 HRS 造成的。其次，像 MCI 的下降这样的因素不可能表明我们试图确定的 HRS 的任何积极影响。

因此，有待观察的是四大投入——即土地、劳动力、电力和化肥——的变化是否部分受到 HRS 改革的影响。

首先，耕地面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开始减少；1975-1979 年间仅减少了 0.2%，但 1980-1984 年间又缩减了 1.5%。²⁶ 这发生在 MCI 下降的同时，这意味着总播种面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减少得更多。²⁷ 很难找到 HRS 改革在土地投入变化中的任何积极作用。

土地投入发生变化。然而，可以说，1980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 HRS 改革，实际上导致了耕地规模的加速下降，换句话说，它抑制了农业生产。

其次，正如我们所讨论的，由于没有关于农作物部门劳动力的具体数据，以及农村普遍存在的就业不足，农业的总劳动力投入很难衡量。回归中的劳动变量系数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粗略的证据，说明劳动力使用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采用林毅夫的方法来计算农作物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总劳动力乘以农作物部门在农业总产出中的价值份额，那么农作物部门劳动力的变化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978 年至 1980 年的年增长率为 0.5%，1980 年至 1984 年为 0.9%。如果我们把农业总劳动力作为作物部门劳动力的代表，那么 1978 年至 1980 年间的年增长率为 2.3%，1980 年至 1984 年为 1.5%。²⁸ 考虑到这一时期 MCI

在下降，我们可以猜测实际的劳动投入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同样，80年代初的HRS改革与劳动力投入的变化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

第三，在过渡时期，机械动力投入和化肥投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产出的变化贡献很大。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者早在HRS改革之前就开始起飞了。如表3.2所示，在HRS之前的五年期间（1976-1980）。机械动力的使用增加了71%，化学肥料的使用增加了118%。这种急剧的增长在80年代仍在继续；在HRS改革的五年期间（1980-1984），机械动力的使用增加了32%，化学肥料的使用增加了37%。很明显，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绿色革命。而机械动力和化肥的急剧增长显示的只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成就。

最后，必须对化肥因素给予一定的特别关注，因为它也被林毅夫认为是产出增长中最重要投入因素。有文献指出，在中国，化肥有两个主要的不可观察的好处。首先，由于前一个集体时代的大量投资，肥料的质量和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高产杂交作物在1970年代末开始引入（这些作物也是在集体制度下开发的），这使化肥和之前建立的节水的效果变得更加有效。²⁹因此，从回归练习（from the regression exercise）中看到的化肥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反映了上述两个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中国的农业一直受到严重的化肥限制，直到1970年代末，之前的化学投资开始正常运行。³⁰很难说人们因为非集体化而提高了使用化肥的积极性；它只是变得更容易获得。从需求方面看，

国家在 1979 年对定额采购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农民的利润率，这可能有助于他们购买化肥的能力。很难将 HRS 改革与这些任何重要的投入变化联系起来。此外，更清楚的是，过渡时期的巨大投入变化确实是先前存在的制度的内生结果：前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为产出的急剧增长创造了条件。总而言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农业的遗产，而不是 HRS 改革，是过渡时期成功的最重要部分。

注释：

1.1.官方说法是土地承包给住户 15 年，但合同一再延长。事实上，通过暂时的但高度管制的土地市场，土地被私有化了。

2.B. Stone, "农业技术的发展" 中国季刊, 第二期。
116 (1988):767822.

3.同上。

4.同上。

5.以农村水力发电站为例：总容量从 1957 年的 20,000 千瓦增加到 1978 年的 228 万千瓦。（农业部 2009 年，7）。

6.关于提高强度的利弊，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 年

（加利福尼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

7.根据农业部后来的数据（2009：6，17）。耕地指数在 1990 年为 1.55，1994 年为 1.58；1994 年后，耕地面积被调整为 1.55。耕地的规模被调

整为增加，因此，该指数在结构上下降了。1994年后，耕地面积被调整为增加，因此指数结构性下降：2008年为1.28。

8.钟福宁，《中国粮食营销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4）。

9.同上。

10.例如，见 T.Sicular 的表 A1，"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规划和定价"中国季刊，第 116 期（1988 年）。671-705.

11.例如，见文冠中，"中国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中国农业部门的变化：1952-1989 年》，《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42 期，1 (1993)；1-41；范圣根和张晓波"中国农业的生产和生产力增长。新的增长：新的国家和地区措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 50 期，第 1 页。变化 50, no.4 (2002):819-838.

12. K. P. Kalirajan, M. B. Obwona, and S. Zhao, "A Decomposi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 Decomposi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中国农业增长的案例改革前后》，《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 78 期。

13. no.2 (1996):331-338.

13.路易斯－普特曼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和比较。

这种类型的工作。见《中国农村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第七章。

见《中国农村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七章。

14.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 and Lijing Zhu,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杂志》第 97 期。

政治经济学》97, no.4 (1989):781-807.

15.有趣的是，他们不考虑技术进步的理由是 "中国的农业在这一时期之前已经达到了技术上的先进状态。

16.卡罗尔－卡罗尔，《1980 年代中国农业增长的来源》（波士顿。波士顿大学出版社，1992）。

17.Carl Riskin, 《中国的政治经济》。自 1949 年以来对发展的追求，1949 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年）。

18.克里斯·布拉莫尔，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1996（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19.韩东屏，《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纽约：月刊出版社，2008 年）。

20.克里斯·布拉莫尔，《农业 "奇迹 "的起源。四川的一些证据四川》，《中国季刊》，第 143 期（1995 年）。731-755.

21.路易斯·普特曼，《进入华北地区的后集体主义时代》。大河镇”，《现代中国》第 15 期（1989 年）：第 3 页。3 (1989):275-320.

22.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222-251。

23.林毅夫，“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美国经济评论》82，第 1 期（1992）。34-51.

24.我从林毅夫的发展论坛下载了林毅夫的原始数据集，[http://](http://jlin.ccer.edu.cn/)

jlin.ccer.edu.cn/这个页面已经不能用了，如果需要请与我联系以获得

该数据集的副本。

25.布拉莫尔，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329。

26.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38节）计算的。

27.对耕地面积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通常认为70年代和80年代的官方统计数字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土地面积；但是，这并不改变农村改革后耕地减少率较高的事实。事实上，最近的数据表明，土地面积在1980年之前一直在增加，而在1980年之后开始下降。耕地面积在1980年之前一直在增加，而在1980年之后开始下降（Bi and Zheng, 2000）。

28.计算的依据是农业部（2009，5）。

29.布拉莫尔，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247。

30.斯通，“农业技术的发展”。

附录 1：第三章中对林氏论文细节的复制

林毅夫论文中的核心模型如公式 1 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实际作物总价值为产出，有四个输入变量：土地、劳动力、电力和化肥。此外，还包括六个特别变量：年底采用 HRS 的团队比例（HRS）、市场价格相对于制造投入价格的指数（MP）、相对于工业投入价格高于配额的价格指数（GP，来自表 3.3，第 3 栏），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百分比（Ngca），多种作物指数（MCI），以及时间趋势（T）¹。包括 28 个省级虚拟变量（provincial dummies）

以解释未观察到的土壤、文化和政治因素。林毅夫还做了一个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包括时间虚拟变量，以捕捉特定年份的因素，如天气和价格变化。²表 3.4 第 1 列和第 2 列复制了单程和双程固定效应模型。

1. 林毅夫论文的附录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做了详细的解释。
2. 全国物价比率指数变量被删除以避免共线性。

$$\begin{aligned} \ln(Y_{i,t}) = & \alpha_1 + \alpha_2 * \ln(\text{Land}_{i,t}) + \alpha_3 * \ln(\text{Labor}_{i,t}) + \alpha_4 * \ln(\text{Power}_{i,t}) \\ & + \alpha_5 * \ln(\text{Fert}_{i,t}) + \alpha_6 * \ln(\text{MP}_{i,t-1}) + \alpha_7 * \ln(\text{GP}_{i,t}) + \alpha_8 * \ln(\text{Ngca}_{i,t}) \\ & + \alpha_9 * \ln(\text{MCI}_{i,t}) + \alpha_{10} * \text{HRS}_{i,t} + \alpha_{11} * T_t + \sum_{j=0}^{27} a_j D_j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其中，Y = 以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每队农作物产量

土地=每队的耕地

劳动力=每队的加权劳动力

力量 = 使用的总动力（机器和草畜）。

肥料=每队的施肥量

在这里，我们根据文中提出的批评意见，通过调整林的模型来估计 HRS 的效果。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这些调整进行操作。

首先，正如本研究认为的那样，在没有任何详细数据说明年产前的实际 HRS 采用率之前，使用 HRS 的一期滞后值似乎更合适。这样一来，模型中所有归因于 HRS 的生产进展都将是合理的。第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似乎是更可靠的规格；因此，它将继续被本研究使用。

这也意味着林毅夫使用的有问题的价格指数在这里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它将被放弃，价格的影响将由年份的虚拟变量来体现。

第三，天气状况（数据来自表 3.2）将被添加到模型中，以观察年度虚拟变量（year dummies）是否能完全捕捉其影响。基本模型在方程 2 中显示为一个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其变量与林毅夫使用的几乎相同（变量解释见最后一节）。

$$\begin{aligned} \ln(Y_{i,t}) = & \alpha_1 + \alpha_2 * \ln(\text{Land}_{i,t}) + \alpha_3 * \ln(\text{Labor}_{i,t}) + \alpha_4 \\ & \ln(\text{Power}_{i,t}) + \alpha_5 * \ln(\text{Fert}_{i,t}) + \alpha_6 * \ln(\text{Ngca}_{i,t}) + \alpha_7 * \ln(\text{MCl}_{i,t}) \\ & + \alpha_8 * \text{HRS}_{i,t} + \alpha_9 * T_t + \sum_{j=0}^{27} a_j D_j + \sum_{k=0}^{17} a_k T_k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结果在表 3.4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中说明；第一个模型没有考虑天气因素，而第二个则考虑了。

我们的结果是否稳健？特别是，我们对 HRS 的影响感兴趣，如果年末 HRS 的一部分确实对该年的生产力有一些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林毅夫显示的是 HRS 最有利的情况，上述练习只是说明了一个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但是，如果真实的情况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就需要进行一些敏感性测试来更好地理解 HRS 的作用。11 个备选的 HRS 指标是作为连续几年 HRS 值的加权平均数来构建的。第一个 HRS (hrs0) 衡量标准与林毅夫 (1992) 相同，即对前一年的 HRS 赋予零权重；前一年的 HRS 的权重每次增加 10%，最后一个衡量标准 (hrs10) 与滞后一年的 HRS 相同。结果见表 A1（见下文），其中单独列出了

HRS 测量的系数和 T 值。随着前一年 HRS 权重的增加，这意味着更多的非集体化发生在下半年，HRS 的效果稳步下降。从 hrs5 开始，也就是在上半年和下半年平均分配的非集体化过程，HRS 在统计上不再有意义。考虑到我们以前对中国非集体化步伐的讨论，假设超过一半的生产团队在某一年的下半年采用 HRS 是比较合理的，这反过来表明 HRS 更有可能对生产力的变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敏感性测试为我们的结论增加了更多的信心。

TABLE A1: Sensitivity Test

	Coefficient	T Value
hrs 0*	0.15	3.00
hrs 1*	0.15	2.29
hrs 2*	0.15	2.23
hrs 3*	0.14	2.12
hrs 4*	0.13	2.03
hrs 5	0.12	1.89
hrs 6	0.11	1.75
hrs 7	0.09	1.64
hrs 8	0.08	1.47
hrs 9	0.07	1.37
hrs 10	0.06	1.22

*Significant at 5% level.

第四章 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介绍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的非集体化是中国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最重要方面之一。邓小平称它是一项创新，它对整个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改革”进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¹ 中国政府多次提到非集体化的所谓经济利益，声称它“大大增强了对数百万农民的激励”²。然而，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影响一直是高度模棱两可的，充其量是值得怀疑的。主流报道中经常把个人或者小部分农民描绘成启动这一进程的政治明星，但这却掩盖了许多地方对非集体化的巨大阻力。此外，大多数著作都淡化了土地改革的深层原因的后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农村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中立的。

少数作品确实报道了非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影响，但即使是这些作品，也往往是以陈词滥调的方式处理，与官方的历史保持高度一致。其中一个流行的论点是，农民想要摆脱集体控制，所以他们创造性地集体解散了自己的集体。³ 一种典型的分析倾向于遵循这样的故事线：

农村集体造成了多年的贫困与懒惰，所以勇敢智慧的农民签订了秘密契约，进行家庭耕作，由于去集体化的强大激励作用，农业生产力急剧增加。一旦非集体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就不得不接受了这一反映农民意愿的制度创新。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证明的那样，非集体化并没有效率产生令人称道的影响。这表明，除了效率和激励因素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主流叙事中缺少对阶级的分析。

本章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非集体化的过程。我认为，非集体化是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政治基础，因为它不仅使农民丧失了权力，而且打破了工农联盟，从而大大减少了改革阻力。农村改革对中共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正是中共将非集体化解释为自发的和纯粹经济的原因。

揭开围绕非集体化的政治神话

关于非集体化的历史所创造的两个最突出的神话是：“（1）整个运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和非政治的。以及（2）唯一反对非集体化的是村干部，而不是农民。由于这些神话是主流解释的支持，因此值得批判性地研究。

自发的运动？

1980年代的非集体化被贴上来一个自发的、反对以前集体的基层行动的标签。在这个版本中，大多数农民想要实现非集体化，而中国

共产党在改革中是被动的。但仔细阅读一下实际的历史，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所有关于农民集体解散自己集体的轶事似乎都与非集体化的基本逻辑冲突。对非集体化的主流解释是，农民不同意集体生产，但正如布拉莫尔 (bramall) 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农民能够按照自己所说的方式组织他们的非集体化，那么集体农业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就不需要非集体化了。⁴也就是说，必须有集体组织的历史才能做到这一点。公平地说，这并不是要否认有小集团的非集体化的个别案例；然而，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大多数案例是不符合历史的。

事实上，在早期，中共自己的旗帜杂志《红旗》自豪地声称，非集体化是由地方当局按照上面的指示进行的。⁵我们在官方的省级记录中找到了更确凿的证据证明农业改革的强制性。1980年，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宣布它不会实施非集体化。然而，在1982年，它决定遵循国家政策，并迅速对其农村经济进行了非集体化。⁶北京地区在80年代初期也试图维持集体经济。然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评了北京干部在1982年抵制非集体化的行为。此后，中共北京市委迅速发布公告，声称尽管一些干部没有解放思想，对取消集体仍保留意见，但改革仍应迅速实施。⁷

在云南省，截至1981年3月，仅有3.5%的生产队实施了非集体化。省领导在5月份召开了一次“统一去集体化思想”的会议，并在11月提倡一种去集体化模式。到年底，一半以上的生产队被解散。⁸

在浙江省，官方记录指出，当地领导人对非集体化并不热心，并

将此归因于“缺乏认识”。省级领导关于维持集体经济的谈话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这些不寻常的语气表明，由于非集体化的导人和支持非集体化的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8月和9月，浙江召开了几次干部会议，纠正“农业改革中的左倾错误”，提倡家庭农业。结果很明显：非集体化从1982年的不到40%上升到1983年4月的90%以上。

9

湖南省也有类似的情况。湖南省领导人最初支持集体经济。然而，在1981年春天，几位中央领导人前往湖南，推动非集体化的进程，此后，省委书记不得不正式为他不理解重要政策和非集体化的缓慢步伐而道歉。随后，地方领导开始了非集体化运动，在一年之内，近80%的生产队实施了去集体化。¹⁰

全国范围内非集体化的设计师杜润生在他近期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多内部信息。杜润生声称，一些省份只有在更换了领导层后才接受家庭农业；这个名单包括几个重要的省份：福建、吉林、湖南、广西和黑龙江。¹¹此外，杜润生也记录了中央领导人是如何运用他们的权力来推动非集体化运动的。例如，中共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前往河北省，批评了河北省在采用家庭农业系统方面的缓慢；此后，家庭农业模式迅速实施。¹²胡耀邦还公开声称，那些反对非集体化的干部应该被撤职。¹³来自上面的压力在文献中也有充分的记载。¹⁴例如，一位非集体化的辩护者承认，“虽然家庭农业开始是农民的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农民社区都希望这样做。”但他仍然声称，在非集体化之后，大多数农民似乎都乐意接受他们的土地份额。¹⁵一些作者显

然是有选择性地提供证据，例如，Kate Xiao Zhou 引用了黄树民的《盘旋之路：当地干部眼中的中国乡村变迁》一书来说明非集体化是自发的；然而，她忽略了同一本书中关于非集体化是由中共强制执行的故事。¹⁶

很难说有多少农民真正倾向于家庭生产，但根据中国农村问题专家贺雪峰说，在他的全国调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对非集体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¹⁷很明显，中共在 1980 年代初期，随着整个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实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Kate Xiao Zhou 声称，从来没有一个工作组被派到村子里去进行去集体化。她认为这是非集体化运动中没有国家强制力的重要证据。¹⁸但一些省级记录提到了大型工作组；例如，在福建省，有超过一万人被派去实施去集体化运动。¹⁹此外，当现有的政治机器支持非集体化并具有政治能力时，就不需要工作组了。关于江西省的一个工作组的采访生动地说明了农民的被动角色。

“共产党的干部曾在公社开过一次会。然后队长回来了，开了一个小组干部会议。干部们把这个制度称为“分田到户”（divide the land to the households）。干部们没有宣传这个制度，他们只是召开了一个[小组成员]会议，说这是要做的事情。”²⁰

即使是那些不一定支持集体的研究人员也声称，非集体化运动远非自发的。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和 Jonathan Unger 记录到，就像以前的许多运动一样，当北京表示强烈希望看到非集体化被采用时，一些似乎不愿意实施改革的地方干部发现自己因左派思想而受到

公开谴责。²¹ 托马斯－伯恩斯坦 (Thomas Bernstein) 承认, 到 1982 年, 采用家庭模式已经成为遵守党的现行路线的问题, 并且不顾当地人的喜好而强行推行。²²

这些证据对“非集体化是一种自发的集体行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表明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化的, 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 1980 年代初期, 对非集体化的抵制的性质是什么?

反对非集体化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神话。非集体化的反对声音很大, 主流的结论是, 这种反对意见一定是来自一些干部, 他们只是害怕失去对农民的控制。²³ 这也被概括为主流媒体经常引用的一句话: “上面盼, 下面望, 中间有个顶门杠。” (上层领导同意, 下层农民希望, 中间干部阻挠)

一些干部可能不愿意去集体化, 因为“管理会变得很困难”, 但很难相信大多数干部会仅仅因为“失去控制”而反对中央领导的政策。²⁵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 反对非集体化几乎是政治自杀; 另一方面, 遵循中央政策可能会有相当的回报。大卫·茨威格 (David Zweig) 记载, 陕西省于 1978 年更换了志丹县的领导层, 因为该县继续支持激进的土地政策 (即集体化) ²⁶1979 年冬天, 新的县领导班子将土地分配给全县 90% 的生产队和家庭。这不是一个孤例。韩东屏也指出, 山东即墨县被迫接受农业非集体化, 反对的地方领导人被免职。²⁷ 在河北省的一个极端案例中, 一名支持去集体化的基层研究人员被直接

提拔为中共省委书记。²⁸（白石，1983年由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副处级），直接一步跨进省委领导班子，先后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央纪委委员等职。——译者注）省级领导干部在短时间内抵制去集体化，但他们一旦意识到中央领导人的意图，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转变”，以确保他们的政治地位。²⁹仍有一些支持集体的省领导人能够抵抗，但他们支撑不了多久。³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观察到，农村干部最初对他们的新任务不满意，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从改革中获利，通过利用政治技巧和人脉来保持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收入。³¹有趣的是，黄树民也认为，尽管集体企业中的普通农民和工人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担心，并提出强烈抗议，但许多地方干部却非常热衷于推动非集体化，因为他们可以接管集体企业并从中获利。³²他们作为集体领导人积攒的经验与人脉，如今允许他们经营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企业。韩东屏描述了类似的政治变化。³³随着非集体化，集体企业被村的党政领导与管理人员控制，他们往往不顾村民的强烈抵制，租用企业或直接购买企业。非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权力：集体经济利益的丧失使他们的政治权力支离破碎。与此相反，村领导能够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因此，他们从非集体化中吃得满脑肥肠。

尽管传闻中一些高级干部也反对改革，但他们的声音从未在公众场合中出现过。³⁴一些作者试图找到一些反对非集体化的中央领导人，但他们的论点并不令人信服。以 Kate Xiao Zhou 为例：她认为赵紫

阳总理是 1980 年反对非集体化的中央领导人，但在同一页，她又把赵列为同年另一个支持非集体化的领导人之一！³⁵事实上，早在 1980 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高度赞扬了非集体化，因此任何中央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反对，这是麦克法夸尔观察到的事实，赵紫阳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³⁶

黄树民记录了中国南部的一个故事：上级部门和一些村民向当地领导人施压，要求解散其集体，但该领导人一直抵制到 1984 年。³⁷不是因为他害怕失去控制，因为无论在非集体化之前还是之后，他都能保持着不受挑战的权力地位。他只是觉得，一个运行良好的体系不应该被破坏。

省级官方记录了一些农民和干部的反应。例如，在吉林省，一些老党员公开声称，没有集体就没有社会主义，更谈不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一些干部在分耕地和耕畜时泪流满面。他们由衷地担心，集体的优点如规模经济、机械化和多样化生产在非集体化后会不复存在。

38

另一份来自安徽省六安地区的报告也很有启发性。³⁹作者王延海仔细记录了 1979 年干部之间关于非集体化的两次辩论。支持集体的干部对于非集体化提出了几项重大批评。首先，他们认为领导层，而非集体化，可以解释农业的增长。其次，在所有拥有更多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农民中，只有 30% 的人希望实行非集体化。第三，农业自然需要在灌溉和耕作方面进行集体决策。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论证，与对“失去控制”的担忧毫无关系。因此，支持集体化的一派实际赢得了第

一次辩论。然而，在第二次辩论中，他们显然受到了反集体主义领导人的压力。结果，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妥协，他们的批评实际上被驳回了。

非集体化的政体改革对干部有潜在的好处，但对普通农民却不然。⁴⁰1981年出版的获奖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the innocent country moon)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态度展示了对改革的不同态度。一位受过教育的年轻干部开始了非集体化改革，其他“领导”反对他，而“农民”欢迎他；一些反对非集体化的妇女先是反对他，后来才同意他的改革思路。⁴¹在这部小说中，前面提到的矛盾被领导人的超人精神解决了：他故意把劣质土地分配给自己，而不是趁机利用土地分割的机会占便宜。此外，他还为那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不分昼夜地免费工作。然而，逻辑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这个领导是如此富有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那很难想象他为什么不能带领农民进行集体生产。

将农业改革描述为源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运动，并受到地方干部的反对，这种解释是有致命缺陷的。干部和一小部分农民实施改革并从中受益。普通农民对拟议的改革并不热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反对改革。但是，如果非集体化实际上是由中共的干部和其他优势群体领导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中共在土地关系上的政党路线，或许能对这个问题有所启发。

政治风云的变化

1976年9月，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

久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最具权势的人。尽管他和他的盟友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家庭生产，但一开始并不清楚他是否想如此迅速地解散集体经济。在他 1978 年的著名演讲中，概述了他广泛的市场改革计划，他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农业。⁴²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

很明显，他不欣赏毛主义的集体经济，因为其收入分配是平等的。然而，他对集体经济的批评是非常笼统的。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共也通过了一项关于农业发展的新决议，该决议鼓励集体依靠经济激励和提高采购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⁴⁴有趣的是，中共的官方文件认为，集体农业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分子”的遗留问题。然而，所有的新政策都明确保留了集体模式。

1981 年，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决议中，中共终于就党的历史达成了普遍共识。⁴⁵这份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党内的争论，并对毛泽东及其政策进行了正式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报告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方面，并声称它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成本，但它称赞了农业，因为它增加了粮食产量，是少数几个“稳定增长”的领域之一。按照这一思路，一些历史书也认为，尽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但农业仍在稳步发展。⁴⁶

但在快速去集体化之后，集体经济开始被视作“停滞不前”。胡耀邦 1982 年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这样的说法；“[由于我们]纠正了以

前'左'的方向性错误……农业的表现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停滞到繁荣。”⁴⁷从那时起，这成为对集体农业的标准描述。现在，集体农业的问题不仅被认定为极左，而且被认定为正常的左派有关。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务院农业委员会主任杜润生明确解释了什么是左的错误：“农业中的“左”倾错误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直到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去集体化）给予了强烈的冲击；长期抑制的激励措施得以释放，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妖魔化集体，这仅仅是在中共赞扬集体农业“稳步发展”一年之后。然而，对去集体化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1984年后，粮食生产一度停滞不前，中共领导人再次改变了他们的调子。赵紫阳声称，如果农业要向前发展，就需要去集体化以外的政策支持。⁴⁹杜润生也淡化了去集体化，说农业最终取决于更多的技术进步。⁵⁰

有趣的是，集体农业并不总是被妖魔化；事实上，对集体农业的评价因政治气氛而异。正如 D.Y Hsu and P.Y.Ching 所发现的，副总理田纪云曾“承认改革前三十年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是改革后农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原因”⁵¹1989 天安门事件后，政治人物不得不假装比 1980 年代更“左”一些。正如 Hsu 和 Ching 所观察到的，领导人开始反复赞扬过去四十年的成就。⁵²1989 年，时任中共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特意将农业改革的名称从“家庭责任制”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改为“责任制” (responsibility system)

⁵³ 这种变化虽然微妙，但含蓄地低估了改革中去集体化的实质。⁵⁴ 然

而,随着 1990 年代初政治压力的缓和,“家庭责任制”的名称又被恢复,并一直保留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报告中,农村经济的去集体化被认为是引领了整个市场改革,并对其做出了巨大贡献。⁵⁵

但自从新世纪开始,党的家庭生产路线再次发生了变化。领导人曾经坚持认为只有个体或家庭农业才能提供有效的激励,他们现在认为,只要农民是为资本家老板工作的雇佣劳动者,只要他们在一起工作,激励措施就会有效。新的政治论点维持家庭农业对集体农业的优越性,但同时也指出了小家庭耕作的局限性。作为替代方案,它要求土地整合,以达到足够的规模启动农业投资和更有效的管理。因此家庭生产现在被认为是低效的。当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反对集体化的论调中从未提到过这一评估,当时小农被宣称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56

2002 年和 2008 年中共第十六届和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分别通过的决议明确了这一新路线。⁵⁷特别是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关于农村发展,鼓励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集中土地用于更有效的大规模农业生产。

主流媒体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鹦鹉学舌。起初,集体农业是好的,但后来家庭模式被赞为最好的。现在,责任制(HRS)的产量不够高,土地整合才是答案。农业单位的理想规模从大到小,然后又回到了大。然而,所有制结构却发生了单调的变化,集体所有制不断受到侵蚀。也许党的路线变化可以为我们指明整个农业变革的因果解释。至少它

们让我们对推动去集体化背后的政治动机更为好奇。

后毛泽东时代去集体化的原因和后果

就尽管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层成员都倾向于家庭农业，但仅凭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解释整个农村的去集体化。改革有可能被强制执行，但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此顺利地进行。邓小平和其他务实的官僚也不可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支持改革。本节分析了去集体化的政治原因，以及同样重要的条件。

阶级斗争的“终结”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支撑毛义社会的一切似乎都变了。事实上，对文革分子无休止的谴责，在文革和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失势的老干部的迅速复出，以及描述前一个时代破坏性影响的所谓伤痕文学（scar literature）的出现，都标志着毛及其盟友在政治上的失败。⁵⁸ 官僚们与毛时代丧失特权的上层知识分子结盟。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如恢复高考，是获得他们支持的方式。正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所言，邓小平之所以能从毛泽东的直接继任者华国锋手中接过权力，是因为他在干部、军队和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⁵⁹ 尽管这些政治部门在过去可能有分歧，而且在未来还会有分歧，但在 1970 年代末，他们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认为需要建立稳定的官僚秩序，结束文化大革命等毛主义群众运动。

这种变化反映在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中。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一项决议，指出中共的中心原则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现代化”。该决议还声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得到纠正，工人和农民的主要政治敌人已经没有了。这一点在 1981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会议正式宣布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中国的主要矛盾⁶⁰当然，这种说法只有在官僚及其盟友现在对国家享有压倒性权力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中共内部的主要政敌已被打倒。然而，工农还没有被驯服，仍然是官僚的潜在敌人。

对现代化的大力推动，加上对发达国家财富的羡慕，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中国必须利用先进资本主义的科学和先进技术及管理来追赶他们。什么是“科学和先进”？事实上，邓小平早在 1978 年就给出了答案：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具体来说，这个模糊的术语意味着更多权力归管理层，更多权力归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基于奖金和惩罚得更严格的劳动纪律。⁶¹

事实上，从 1970 年代末开始，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改革已经在城市工业中开始实施。⁶² 尽管中国领导人的现代化意图明显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受到工人的欢迎，但这些趋势和潮流并没有造成直接的社会冲突。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试图从工农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而是假装与他们妥协。在农村地区，农产品采购价格大幅提高，在城市地区，工人们得到了更多的红利和奖励。⁶³ 这些激励措施应该是为了提高工农的生产力，事实上，农业和轻工业后来也得到了快速增长。但有资本头脑的干部和工农之间的蜜月很快就结束了。

挫败的城市改革

工业领域的现代化计划实际上是对国有企业工人的一场战争。当时是工人的作家蒋子龙，于1979年出版了一部小说，说明了改革派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冲突。⁶⁴在小说中，一位新上任的厂长和他的妻子都很聪明，他们最近都在先进国家苏联学习过管理技术，他们观察到，由于文化大革命后理想的沉沦，工人们都很懒惰，互相推卸责任。按照标准的“科学管理”技术，他们对工人使用非常苛刻的方法，包括解雇一千多名非终身工人，以提高生产力。许多工人对新厂长恨之入骨，给厂里的党委书记写信投诉，希望中共能拯救他们。然而，党内书记和厂长的想法是一样的。最后，上级领导鼓励厂长放心大胆地进行实验，工厂的管理层决定去一些先进国家学习新的管理技术。

这部小说描述的正是城市改革的方向。不是增加工人的参与度与政治权力，而是让领导人成为指挥官，工人只是被训练来为生产服务。在这部小说中，领导层的目标是现代化，但这个目标在未来很容易转变为领导层的利益，因为工人根本没有权力。然而，在1970年代末，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有相当大的权力。甚至许多支持改革的工人也不接受资本主义。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典型：虽然他一开始就主张改革，但蒋子龙近年来重新思考了改革，并公开反对私有化和压迫工人。

65

根据麦克法夸尔的说法，城市改革给中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为自80年代开始，反对的声音就很激烈。⁶⁶虽然没有立刻引起社会紧张，但城市改革的失败在1979-1980年的巨额财政赤字中显而易见，

这不仅是由于工农工资增加造成的，也是由于在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之下从外国大规模进口。⁶⁷ 中国人民对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感到震惊，因为在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发生过通货膨胀。⁶⁸ 为了平衡预算，中共不得不关闭许多工厂，这造成了大量的失业。⁶⁹ 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80年代末，由于新大跃进对国有企业的一些负面影响，出现了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加速，经济秩序混乱。”⁷⁰

因此，很明显，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妥协不会继续。首先，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约束工人以获取赚取更多的利润，所以利益冲突迟早会浮出水面。其次，即使干部计划收买工人以获取对改革的支持，鉴于城市的严峻形势，他们也做不到。

城市地区的问题导致了后毛时代中共的第一次政治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在经济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与工人直接发生对抗。因此，1980年，干部们自然转向了农村经济。⁷¹

脆弱的一节

农村经济确实是社会主义的致命弱点。不仅有一分之一的集体经济状况不佳，而且比较成功的集体经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⁷² 集体农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更好的医疗保健和其他生活质量的提高所导致的人口增长，抵消了大部分的改善。例如，在苏拉米斯（Sulamith）和杰克·波特（Jack Potter）研究的公社里，人均分配（人均工分收入）从1962年180元左右的高位下降到60年代和70年代大

部分时间里刚刚超过 100 元的水平，尽管总产值一直在增加。⁷³ 虽然人口增长在 70 年代开始放缓，但这不足以扭转这一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从 1956 年到 1978 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 2.68%；与此同时，人口每年增长 1.95%，因此，尽管农业有所增长，但人均产品的改善是有限的。⁷⁴

其次，农业中缺乏机械化。没有足够的机械化和基础设施，集体耕作不一定比个人耕作更有成效。在毛时代，公社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然而，机械化只是在 1970 年代中期才开始迅速增加。

第四，不同的历史道路导致了集体农业的不同表现。正如威廉·韩丁（William·Hinton）所指出的，他所观察到的成功的集体，都有土地改革和与反动派军事斗争的长期历史。许多强大的农民政治领袖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并很好地领导了集体生产。⁷⁵ 在其他地方，如安徽省，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是由外来者而非当地的政治领导人迅速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地方，集体耕作从未被农民广泛接受。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普遍存在的政治分层抑制了集体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这导致集体农业表现不佳。换句话说，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政治和权力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减少了农民对维持集体的潜在支持。第五章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许多地方的集体农业表现不佳，使得中央当局更容易强调集体制度的低效率，从而强制推行非集体化改革。农民的政治力量从未像城市无产阶级那样强大，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和政治组织的经验。因此，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对弱势使他们成为城市改革失败后的

第一个主要目标。

兜售非集体化

即使有一个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农民群体，非集体化也不容易。它在各个层面都面临着反对。强大的阻力主要是由于农民从集体中获得的利益，以及毛泽东时代长期强调集体农业。但中共确实能说服许多农民，使他们相信去集体化既有效又是社会主义的。这一运动非常成功，值得单独讨论。作为资产阶级宣传和老式革命口号的奇怪结合，这场意识形态运动被证明是有效的。

首先，领导人总是试图让人觉得新政策与社会主义传统相一致。从一开始，干部们就非常注意自己的语言。以“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一词为例。它是故意模糊的——没有人可以拒绝人们对其工作负责的需要。事实上，在毛泽东时期，集体广泛地将小工承包给团体或个人，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集体的性质。⁷⁶然而，激进的去集体化改革被隐藏在“责任制”的名义下，似乎它们与集体中存在的小工承包是一样的。中共通过保留土地集体的名义所有权来区分去集体化和完全私有化。这种含糊的宣传方式帮助农民和干部把改革解释为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进步的。⁷⁷

一个有趣的轶事说明了“责任制”名牌的宣传效果。在去集体化运动中，罗马尼亚政府代表访问中国，询问家庭责任制是否可以简单地改名为“责任制”，因为以前的责任制看起来与私有化过于相似。这个建议很快被决策者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家庭”（即去集体化）比什

么都重要，是改革方案的关键所在。⁷⁸我们可以从去集体化运动中最流行的两个术语中看到故意的模糊性。第一个术语“大包干”的意思是“分田到户，自力更生”。然而，它也有另一个可能的含义“保证工作”。许多人认为这个词指的是第二种意思，而这显然没有任何政治含义。第二个词，联产，意思是“将收入与生产挂钩”，这意味着集体不再负责分配收入。但在中文里，这个词也可能意味着“合作生产”。同样，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它指的是第二个意思。

虽然领导层没能得到工人对改革的支持，但他们从农民那里获得了成功。在过渡时期（1979-1984年），主要是由于采购价格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宣传中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去集体化。因此，许多农民对农村改革持积极态度，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

最后，面对来自支持集体化阵营的挑战，改革派总是避免直接对抗，并使用复杂的外交技巧。例如，1980年代初，许多支持去集体化的报告都承认，农村改革最终会导致集体解散和小农生产的恢复。⁷⁹但他们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承认这样问题；在具体的层面上，他们只会提出支持去集体化的案例。他们还认为，少量的去集体化并不会真正损害社会主义农业。毕竟，他们会乐观地得出结论，坚决支持进一步地去集体化，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总之，工人的强烈反对直接导致了城市改革的失败，这导致中共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农村改革上。由于上述所有因素，农村集体容易受到中共的攻击。同时，我们绝不应低估意识形态在全国农业改革中的重要性。

政治后果

随着农村地区去集体化的成功，中共可以重启他们的城市计划。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这一点。⁸⁰为什么领导层现在对处理工人问题如此自信？

首先，农民不再是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去集体化将有组织的集体农民转变为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大大削弱了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能力。

农民起义的潜在威胁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始终是巨大的，因为他们自己也领导了农民革命。即使是在农村去集体化十年后，一位中国副总理也声称，如果农村出现问题，现政权中没有人能够掌权。⁸¹90年代初的领导人知道，如果农村被重新集体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与党政关系的严重恶化。对被唤醒的农民的恐惧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有许多建议，领导人还是不愿意成立农民协会。⁸²

通过剥夺农民的权力，中共成功消除了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大威胁。比如说，1980年代末，当私有化和市场改革引起的政治动荡不断累积时，农民保持沉默。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被问及农民在

哪里时，回答是：“他们都在睡觉”。⁸³同时，邓小平向其他领导人保证，农民没有问题。⁸⁴即使在随后几年发生的骚乱中，他们也没有像有组织的那样具有威胁性。

第二，传统的工农联盟被打破。农村暂时的收入增长说服了大多数农民支持进一步的改革。还有一个长期的结果：在农业改革之后，中共鼓励个体农民在城市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为城市的私营工业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城市劳动力的过剩大大削弱了国有企业中旧工人阶级的力量。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包括大规模的失业，才使得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导向的城市改革成为可能。

农民的情况并不比城市工人好，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地位下降了，中共安抚他们的需要也减少了。表 4.1 显示了 1980 年至 2010 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例的变化。尽管农民在 1980 年代末的消极态度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城乡差距的大幅缩小感到满意，但同样的逻辑不能适用于后来的时期，因为 1990 年后城乡差距再次扩大了。农民政治力量的下降也间接导致了国家对农业投资的相对减少。显然，政策制定者似乎忘记了农村。农村支出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份额从集体时代的高水平下降了，即使在对农村人口的下降进行了调整之后（表 4.1，第 2 栏）。此外，农村基础设施支出在本已很小的农村财政预算中的份额，与集体时代相比也大幅下降（表 4.1，第 3 栏）。

工农都是资本主义的潜在反对者，中共同时面对这两者是不明智的。然而，在瓦解了农民的力量之后，中共现在可以单独面对工人了。即使农民在晚年磨难重重，他们也没有在集体时代享有的团结与组织。

中共的宣传工作试图使农村改革看起来是自发的，政治上是中立的。然而，从政党路线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改革始终是一个政治舞台。农村改革是后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基础，尽管中共一直试图掩盖这一事实。事实上，毛泽东早在 1962 年就明确了去集体化的政治性：“我们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要集体化还是去集体化？”⁸⁵ 特别是，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虽然当时没有多少工农明白毛泽东的提醒，但他们现在肯定明白了。

TABLE 4.1: Decline of the Countryside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Adjusted Sha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on Rural Areas (%)	Share of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in Total Rural Expenditure (%)
1980	2.5	1971–1980	13.7	39.6
1990	2.2	1981–1990	11.8	22.7
2000	2.8	1991–2000	13.2	25.3
2010	3.1	2001–2006	12.8	25.0

Notes: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is defined as the urb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divided by the counterpart in rural areas. The sha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rural areas is calculated as the share of per capita rural fiscal spending in national per capita fiscal spending to adjust for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ver tim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data after 2006 are not available owing to adjust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Sources: Calculated based 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2009;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05, section 19, 30;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2012, sections 3.1, 9.2.

第五章 农村集体的成就、矛盾与消亡

介绍

批评农村集体的学者经常声称，由于激励结构的缺陷或缺乏监督，集体陷入了效率低下和磨洋工的困局。这些内部问题最终导致了 1980 年代初自下而上地去集体化运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正如我们所证明的，去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它并没有显著地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反对集体主义的人正确地指出，是内部矛盾导致了集体化的消亡，但他们往往高估了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夸大了去集体化的积极方面，而淡化了它的强制性质。他们试图解释集体的问题，但不是基于具体的经验，而是形而上学的，假设了人性的某些特征，如“懒惰”。同时，虽然对立阵营中的许多人正确认识到了集体化的显著成就和去集体化运动的政治经济学，这部分文献仍然需要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去集体化是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实施的，而且几乎没有来自农民的反抗。

本章通过提供松滋市的案例研究，用定性和定量数据阐明论点和论据，以促进这一讨论。松滋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紧邻长江南岸。

松滋市拥有许多中国农村的关键经验：它在 1949 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紧接着经历了土地改革，并在 50 年代实现了集体化（就像全国一样）。松滋市还经历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之后的“困难”时期。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曾一度震动力量松滋市。1982 年，松滋市的地方政府遵照中央政策，和平地解散了农村集体。

在 2010 年的冬季和 2011 年春季，我采访了当地曾在集体时代活跃的农民和干部。我最初从村里当地朋友的推荐中选择了几位受访者。随后，我在第一轮采访的基础上与更多人进行了交谈。附录 2 提供了受访者的一些简要信息。我查阅了当地的官方记录，如县志 (the county record) 和水利志 (the water conservation record)。此外，我还检查了集体会计账簿，其中包括集体的收入、成本和债务信息。

在本章中，我将展示松滋农村集体的两面性：他们取得的显著成就，和他们在磨洋工和效率低下方面的问题，以及去集体化时期和之后的斗争。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自然需要一个以民主和参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进程。如果集体是由分层管理的，那么农民很可能会心怀怨恨，表现出逃避工作的态度。虽然农村集体的消亡主要是由于共产党的政治压力，但分层也导致了农民的被动性和对制度变革的失败抵抗。

农村集体：机构和成就

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松滋的农民被中共的干部组织成集体。并非所有农民都支持集体化，但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该地的官

方历史中没有记录重大的抵抗。

原则上，集体化的过程包括一系列的步骤：首先，成立互助组，农民在其中自主经营。然后是初级合作社，土地和畜牧成为集体所有，但农民根据他们的劳动努力获得收入，并根据土地或牲畜的贡献获得分红。最后，成立了高级社，停止了分红，成员只获得与他们的劳动贡献相称的收入。干部们还成立了人民公社来管理多个高级社。但实际上，在中央和地方领导的指导下，特别是在 1955-1956 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 1958 年的抢建人民公社期间，一些地方的进程非常快，有些步骤被跳过了。

1960 年代初，农村社会结构稳定为三层体系：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生产队是基本的管理层次。多个生产队组成一个大队，几个大队组成一个公社。尽管要服从上级的命令，但生产队在生产和分配决策方面基本上是自主的，正如“三级所有，队为基础”（three-level ownership, team comes first）的政策所描述的那样。

作为基本单位，一个生产队控制着它的大部分产品，有一个独立的账户，与大队和公社的账户分开。通常，一个生产队有一些核心干部，包括大队长、生产队长（production organizer）、会计、出纳员、记工员（负责记录工分）和妇女队长，以及其他几个可能的岗位，这取决于具体条件。¹在理论上，这些岗位是在定期选举中分配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投票。在实践中，我的采访现实，一些生产队 20 多年来都没有举行过一次选举，这不是因为不允许农民投票，而是他们认为现任领导干得好，没必要再投票，或是他们无所谓。²生产大队有

类似的领导结构，只是增加了一名党委书记。然而，大队的官员不是由成员直接选举，而是由队级干部选举产生。在公社一级，大约相当于乡镇的规模，领导人通常由上级共产党官员任命。

生产队的记录员用工分制度记录每个人的日常劳动。集体成员根据他们在一个生产周期（通常是一年）内的总工分获得报酬。实质上，一个人的工分表示他或她在集体净收入中扣除税费、公积金和再生产费用后的份额。不同地区的工分制度各不相同，但一般来说，它是计件工资（基于工作量）和时间工资（基于工作时间）的混合体。³集体还根据预先确定的劳动等级或固有的能力分配工分，例如，最好的男工的工分被定为每天 10 个工分，其他人的工分也相应调整。队长也因赚取工分而获得报酬，但他们的任务——如参加政治会议——很难在工分制度中得到量化。他们被分配的工分数往往高于平均数。⁴

这种描述只是提供了一个总体情况；实际的机构和规范因集体而异。对本章而言，更重要的是集体在整个时期内的表现如何。根据历史数据，这些集体对生产和农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将考察在四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和健康。

农业

松滋的主要农作物包括水稻、棉花和油菜籽（菜籽油）。在集体时代，种子和耕作技术经常得到改进。松滋市有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但直到 1955 年才首次尝试种植双季稻。农民花了几年时间学习如何进行双季稻种植，但到 1975 年，98%的稻田都在使用双季稻。1976 年，集

体开始试验杂交水稻，并逐渐采用这种技术。⁵松滋的棉花种植可以追溯到六百多年前，在 20 世纪初以其质量享誉全国市场。在 1949 年之前，最高的平均产量是 1946 年每公顷 247.5 公斤/公顷。仅在 20 年后的 1966 年，平均单产就超过了每公顷 800 公斤，而 1967-1979 年期间，有 5 年甚至超过了这个产量。⁶在集体时代，油菜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种子改良，播种的时间也逐渐改变，实现了复种。⁷

TABLE 5.1: Crop Yields in Songzi County, 1949–2005 (kg per ha)

Year	Rice	Year	Canola	Year	Cotton
1949	2,685	1949	465	1949	210
1957	3,742.5	1955	517.5	1950–1957	285
1958	4,087.5	1960	652.5	1958–1962	450
1961	2,265	1971	817.5	1963–1979	675
1965	3,735	1978	735	1979–1983	495
1975	3,652.5	1982	1,215	1984–1985	1,140
1979	4,695				
1984	5,190				
1985	5,025	1985	1,275		
1986	5,475	1986	1,125	1986	1,110
1987	4,620	1987	1,155	1987	990
1988	5,547	1988	1,200	1988	930
1989	5,465	1989	1,275	1989	705
1990	5,760	1990	1,395	1990	1,245.00
1991	5,608	1991	1,605	1991	1,200.00
1992	5,971	1992	1,545	1992	1,560.00
1993	6,027	1993	1,755	1993	1,230.00
1994	6,519	1994	1,815	1994	1,230.00
1995	6,390	1995	1,800	1995	1,515.00
1996	5,760	1996	1,740	1996	1,155.00
1997	6,645	1997	1,800	1997	1,455.00
1998	6,600	1998	1,725	1998	600
1999	6,765	1999	1,650	1999	780
2000	6,780	2000	1,740	2000	870
2001	6,780	2001	1,635	2001	1,245
2002	7,005	2002	1,320	2002	1,200
2003	6,585	2003	1,440	2003	1,050
2004	6,735	2004	1,830	2004	1,037
2005	6,757	2005	1,756	2005	1,095

Sources: Songzi Shizhi Committee, 2011, Tables 9.1.68, 9.2.69, 9.3.70; Songzi Xianzhi Committee, 1986, 288, 292, 294.

表 5.1 (见第 85 页) 列出了 1949 年至 2005 年松滋市三种主要农作物的年产量。由于缺乏一些早期年份的数据, 只报告了选定年份的

产量。直接比较集体时代和后集体时代的平均年增长率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农业产出通常在不同的年份之间波动很大，而且很多年份的产量也无法获得。尽管如此，根据这些数据，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些初步的观察。

水稻产量在 1950 年代迅速增长，然后在 1960 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急剧下降。产量在 1960 年代中期恢复，数据显示 1979 年有明显的改善。在去集体化之后，水稻产量继续增加，尽管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有几次大的下降。集体化下的水稻产量增长可以说是良好的，而不是非常惊人。⁸

对于油菜（油菜籽），集体化期间的产量是每公顷 517.5 公斤。在过渡时期，到 1982 年产量增加到每公顷 1215 公斤，但在后集体化时代又停滞了几年。1990 年代初有了明显的改善，但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停滞，21 世纪初严重下降。

就棉花而言，情况更为突出。在集体组织下，产量明显提高，尽管由于数据的质量不高，很难量化产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棉花产量在去集体化后明显下降，直到 1990 年代才再次增长。在 1990 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后，产量开始下降，并在几年内一直低于每公顷 1000 公斤。产量在 2000 年代开始恢复，但是 2005 年的产量（每公顷 1095 公斤）仍然低于 1984 年的产量（每公顷 1140 公斤）。

总体而言，集体农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所有三种作物的产量都有显著增长，其中两种作物（棉花和油菜籽）在集体体制下的表现优于后期。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松滋的集体在农业生产中

取得了良好和持续的表现，尽管肯定还有改进的余地。

基础设施

水资源管理也许是农业生产和人类福利的基础设施的最重要的方面。松滋紧邻长江，几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无数与水有关的灾难。在 1275 至 1911 年间，有记录的重大灾害有 61 次，其中大部分是水灾和旱灾。在民国时期（1911-1949），有记录的灾害有 22 次，包括 14 次水灾和 8 次旱灾。数百万人受灾；1941 年的一场旱灾使总人口约 45 万人中的 30 多万人受灾。⁹

尽管 1949 年后松滋继续遭受自然灾害，但在集体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体组织了所有可用的劳动力参与水利建设。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排水、水坝和水库系统。其中，滢水水库特别值得一提。与许多水库一样，该项目始于 1958 年大跃进期间。数以万计的农民为此做出了贡献，花了 12 年的手工劳动才完成。大坝本身有近 10 公里长，是亚洲最长的人造土坝之一。从这个庞大的工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农村集体的力量。

表 5.2（见下文）提供了 1956-2010 年松滋市基础设施的一些统计数据，重点是水库和涵洞。很明显，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都是在集体时代修建的。有一个水库是在 1981-1990 年期间建造的，但即使是这个项目，也是在 1974 年开始的。同样，1991 年之后的两个涵洞建设，实际上是重建 1980 年之前建造的旧涵洞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在去集体化之后基本上停滞了。因此，有理由声称农村集体提供了仍很重要

的关键农业基础设施。

TABLE 5.2: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Songzi, 1956–2010

	Reservoir		Culvert	
	Number	Irrigation	Number	Irrigation
1956–1970	7	24,727	3	7,733
1971–1980	6	2,167	5	3,500
1981–1990	1	333	2	266
1991–2010	0	0	2	6,466

Note: The years in the table refers to the completion date of the projects. The actual starting dates were often five to ten years before completion. Irrigation (in hectares) refers to the total effective irrigation size under the projects during that decade.

Source: Songzi Water Bureau, 2008, 91, 121.

教育

在松滋，教育过去是，现在也是，基本上是一种特权。到 1949 年春天，只有 20% 的学龄儿童在小学就读。¹⁰ 对于工农家庭来说，初中和高中是一种奢侈品。到 1949 年，在松滋的城市地区只有 3 所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约 1400 人。¹¹

农村集体在教育的可能性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1956 年，有 19 所农村小学，1822 名学生，还有 77 所城市小学。1960 年，各集体建立了 389 所农村小学，有 31599 名学生。¹² 几乎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小学。集体还开始建立非全日制小学 (part-time primary school) 和勤工俭学的小学 (work-study primary school)，以便让忙碌的农民接受一些基础教育。1965 年，小学 (全日制和其他类型) 的总数增加到 1327 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超过 90%¹³，1970 年代，大多数公社都建立了自己的高中；每个大队都有一所中学和一所学校，一些富裕的大队甚至有自己的高中。¹⁴ 教职工被认为是公社的工人，他们像其他农民

一样获得工分，以获得集体净收入的一部分。

表 5.3（见第 88 页）可以看出上述的成就；在集体时代，各级学校的入学率都有很大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入学率在 1970 年代末达到高峰，但随后开始大幅度下降，尤其是高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集体开始创办自己的学校，为孩子们提供教育。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 1978 年，当时的政府认为农村的初中和高中质量不高，并将其关闭。¹⁵ 在去集体化之后，农村集体不复存在，因此不再能够支持地方教育。

TABLE 5.3: Formal Education in Songzi

	Enrollment			Staff	
	Primary	Middle	High	Primary	Other
1949–1955	18,829	854		709	41
1956–1960	63,262	3,678	482	1,804	104
1961–1965	74,627	3,003	461	2,269	154
1966–1970	88,918	6,052	442	2,881	534
1971–1975	119,941	22,883	5,313	4,469	1,694
1976–1978	134,489	47,363	16,195	4,923	3,743
1979–1982	121,732	39,566	8,059	4,643	3,326
1983–1985	117,859	41,436	4,930	4,944	2,315

Notes: Enrollment refers to the annual average enrollment in prim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during the given period. Staff refers to the number of teachers and staff in primary and middle or high schools,

Source: Songzi Xianzhi Committee, 1986, 557, 565.

当然，农村学校提供的大部分教育确实不如资源丰富的城市重点学校好。例如，当入学人数增加十倍时，根本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经验丰富的高中教师。集体的标准做法是请刚毕业的高中生教初中，考虑到发展水平，这是他们能提供的最好的了。尽管如此，农村集体确

实为每个学龄儿童的基础教育提供了制度基础。对教学质量的担忧，应该使得农村学校逐渐得到改善，而不是被关闭。关闭农村学校只限制了一小部分人的受教育机会，其中大部分是城市居民。¹⁶

健康

在集体时代，公共卫生方面的进展令人印象深刻。1947年，松滋市的预期寿命为28.3岁；到1979年，预期寿命已达到59.73岁。¹⁷1957年至1985年，死亡率从1.04%下降到0.71%；1979-1982年期间，1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到0.34%。¹⁸，这些变化的背后是集体时代农村医疗保健制度的健全。

从1958年开始，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小医院，从1959年开始，每个大队都建立了自己的卫生站。此外，农村集体还发展了自己的合作医疗。在这个系统中，集体（公社或大队一级）的每个农民每年缴纳固定费用，积累的资金用于支付当地卫生站的各种费用，包括设备、药品和工资。如果开支超过了缴纳的费用，集体就会用自己的盈余来弥补亏损。正是这种合作制度使农民能够获得并负担得起医疗服务；如果没有农村集体，这些改进是不可想象的。

TABLE 5.4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Songzi, 1950–1985

Year	Institution	Staff	Bed
1950	1	232	8
1956	28	765	272
1966	148	1,058	280
1970	128	1,481	417
1978	82	2,222	1,616
1980	81	2,419	1,772
1982	86	2,518	1,708
1985	127	2,761	2,110

Source: Songzi Xianzhi Committee, 1986, 668.

医疗保健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从医疗护理系统的床位数和工作人员数量中看出。表 5.4（见上文）列出了集体时代选定年份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和床位数量的数字。虽然这些数据不包括村级卫生站，但它们包括公社医院，使我们对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了大致了解。

农村集体内部的矛盾

在概括了农村集体的一些成就后，我们现在将着眼于其内部矛盾。为此，我们将研究两个持续存在的问题：缺乏社会主义政治进程，导致集体内部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分层（和磨洋工）；以及集体生活质量相对较低。这两个方面都给集体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并最终导致了它们的和平消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历史悲剧之一是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的严重饥荒。松滋也没有逃脱：粗死亡率从 1957 年的 10%左右上

升到 1960 年的近 37%，1961 年又下降到 10%的水平。¹⁹ 大饥荒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当时的集体政权至少对此要负部分责任，但集体政权中许多与饥荒有关的问题是短暂的。²⁰ 因此，本书将大饥荒视作对集体政权的冲击，而不是我们试图解决的持续存在的问题之一。例如，在大饥荒期间，生产队失去了对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自主权，这无疑导致了当时农村征粮过多和其他破坏性的做法。但这种结构性的扭曲后来得到了纠正，因为生产队在 1961 年基本恢复了自主权。在 1959-1961 年期间，集体粮食生产大幅下降，但随后又增加了，也没有再发生系统性的粮食短缺。

分层、磨洋工和效率

关于农村集体的讨论中，最具误导性的是磨洋工的问题。在传统观念中，磨洋工是由平均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曾说过句名言：“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就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²¹ 一些作家认为农村集体过于平均化，造成了效率低下，最终导致了制度的消亡。²² 一些研究报告称，由于监督成本高，农民尽可能地推卸责任，这导致了效率低下。²³ 这种观点与人性懒惰、以自我为中心，容易上当受骗，厌恶担责的假设是一致的。²⁴ 我认为，我们需要牢记集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特别是与后集体时代相比。集体中当然有磨洋工的现象，但我将论证这不是平均主义或集体制度本身的结果，而是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如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副产品，包括分层。

集体中的主要物质激励结构是工分制，该制度运行得非常良好。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记分员，根据所承担的劳动，分配不同的工分，而工分最终会转化为收入分配。与大众想象中同质化与僵化的制度不同，农村集体中的农民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了不同的规则。²⁵

农民在建立集体机构方面很有一套。一般来说，“按劳分配”（allocation to labor）的原则得到了维持。两种常见的激励结构确保了巨大的努力和公平的奖励分配。在农业方面，最艰巨和最重要的工作是播种和收获。每个生产队都对自己的土地进行了完整而详细的记录，其中每块地的特征和大小都有明确的测量。村里的每块地都有一个人人皆知的绰号，例如头山地（First-Hill Plot）、二道沟地（Second-Ditch Plot）、刀把地（Knife-Handle Plot）等。在收割前，农民会评估每块地的产出，并起草一份工分分配准则。如果地里的庄稼长得高，意味着体力劳动就会比较轻松，那么建议的工分分配就会相对较低；如果庄稼长得很密，建议的工分分配就会比较高。这种看似微妙的任务，任何有经验的农民都能很好地处理，就像大学教授能给学生打分和写论文一样。这个过程是可以批评和讨价还价的：比如说，如果没有人同意按建议的工分收割地块，干部就得改变工分分配，直到有人愿意承担这些工作。在这个过程之后，每块特定的土地都会被分配给劳动者。监督是没有必要的。每个人只需到记分员那里，报告他或她完成了哪些地块，并得到建议的工分。由于每个人都知道谁在哪个地块工作，以及他或她工作得有多努力，所有不可能有搭便车（get a free ride）的机会。²⁶

在其他情况下，如建设项目，农民也想方设法确保工作得以妥善

完成。一个常见的方法是组队工作，也就是说，两个人必须同意一起工作。在生产队中，每个人都通过集体劳动的过程互相认识对方，人们只会选择与勤劳诚实的人一起工作。那些名声不好的人，除了从同类人中寻找搭档外，很难找到其他搭档。在这种制度下，“搭便车”（the free-rider problem）的问题被降到最低。

工分制本身是很发达的，一般来说，收入分配合理。许多农民声称，他们在集体时期日以继夜地工作；事实上，大多数村庄每年只在春节期间有五天假期，而现在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²⁷那么，磨洋工是在何时何地发生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区分两种磨洋工的情况。首先，在任何一个集体中，都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工作，并试图尽量减少他们的努力：这样的懒骨头不是大多数，但他们并不少见。李怀印评论说：“干活开小差不可避免地会以隐蔽的方式不时地发生，但是，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约束之下（包括社员个人之间在集体劳动时的相互较劲，由生产队所有成员的集体归属感和共同利益所驱动的团体压力，以及干部的监督、验收），公开的、完全无视农活质量的大呼隆现象很少会出现。”²⁸其次，有一些情况，通常是在贫困的集体中，整个生产队作为一个单位根本没有发挥好作用，一切似乎都是一团糟。第二种形式的磨洋工发生在“非正式和正式约束”不起作用的地方。

第一种形式的磨洋工描述的是一种个人特征，如懒惰，只要不造成集体收入的分配不公，就不会是农民的主要关注点。如上所述，工分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运作良好，人们很难利用这一制度。有时人们得

到的报酬比他们应得的多；这些情况通常是干部滥用职权的结果：报酬高的劳动者，要么是干部，要么与他们关系密切。简而言之，这是体制内政治分层的结果。²⁹

第二种逃避工作的形式很严重，值得更多关注。同一公社的不同大队或同一大队的不同生产队的生产率可能相差很大。那些表现不佳、通常很差的集体经常被描述为“懒惰”，但更准确的标签可能是“功能失调”。

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的记录。苏联共产党在 1930 年代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偷懒的人得到的回报比自觉努力工作的集体农户要高。集体农场管理中的这些缺陷降低了成员的积极性。”³⁰ 毛泽东也说过，如果干部和工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官老爷。”³¹

一位地方干部讲述了他在这种情况下的工作经历。1979 年，他被县政府派到一个极度贫困的生产队。那里的农民在淡季时每天吃一顿饭，在旺季时每天吃两顿饭；整个大队可以说是萎靡不振，功能失调。领导人的表现尤其糟糕：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性关系。生产队长还试图利用一个新“下放”的女学生，命令她住在自己家里。这位干部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决定接管生产队的政治领导权，开始以生产队队长的身份做一切事情。我召开组织会议，计划全年的生产，第二天，我是第一个

去田里干活的人，此后我一直这样做。除了工作，我还过着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这叫“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天后，农民们开始和我一起干活，他们真的很努力。整个压抑的气氛被一个充满活力和丰富多彩的环境所取代。那一年，在物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生产队的产出翻了一番。”³²

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懒惰”可能会随着不同的政治环境而改变。

当 Carl Riskin 论证中国集体的工作激励问题时，他认为毛主义制度（按劳取酬、集体物质刺激、参与管理）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工作热情。³³ 这种积极的工作态度，即 X-效率，解释了集体制度下的创造力和努力。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如果这个制度不起作用，消极的工作态度会大大降低努力程度。比如说，如果干部腐败，不与农民合作，那么农民就会认为自己是低工资的雇员，很容易泄气。然而，如果干部勤劳诚实，人们就会把集体看作是自己的，并保持斗志，努力工作。³⁴ 事实上，农民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干部和政治领导的作用。一位前生产队长解释了管理一个成功生产队的关键：“第一，不要有私心；第二，在各种工作中起带头作用。”³⁵

因此，从本质上讲，磨洋工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冲突的故事。在社会主义集体中，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人们为整个社会，而不是他们个人工作。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自然需要一个以民主和参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进程。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农民很可能会积累怨恨，并且开始磨洋工。

在实践中，分层和磨洋工都不一定导致效率低下。分层虽然对社

会主义集体不利，但却是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如果有足够的监督，一个高度剥削的资本主义公司仍然可以是有效率的。同样，如果有足够的监督，一个有明显分层和磨洋工的集体仍然可以是富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如果领导人没有经验，不善于组织，一个民主和平等的集体可能就不会那么有效率。有时农民把他们的领导人描述为“老好人”（good fellows），这意味着他们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不是好的组织者。³⁶ 总而言之，是缺乏社会主义政治进程，而不是相反，导致了一些集体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虽然在闲谈中将其解释为懒惰可能很方便，但关于磨洋工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误导性。

政治分层的持续性

许多农民认为集体内部的政治分层是一个主要问题。³⁷ 但非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如何持续存在的？集体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民主的；正如苏拉米斯·波特（Sulamith Potter）和杰克·波特（Jack Potter）所评论的，生产队一级的政府是民主选举的。³⁸ 但是历史一再警告我们，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也就是说，民主不应该按照表面价值来看。

有几个历史原因使农村集体在实践中不那么民主。首先，许多农民是文盲，没有什么自我管理的经验。其次，许多农村干部由于对革命的贡献和多年的辛勤工作而享有威望。这意味着他们希望自己的命令能被轻易地服从，而不是被质疑。第三，虽然生产队长是由社员选举产生的，但大队和公社的上层干部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不是由农民选出来的，与农民的直接联系也少得多。

然而，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干部拥有与革命前地主相当的权力。正如李怀印所指出的，与革命前和后集体时代的同行相比，集体时代的干部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约束。³⁹ 此外，集体时代的许多干部非常自律，特别是相对于现在的干部而言。然而，即使是最细微的民主障碍也可能导致分层。作为集体的领导，干部们负责组织生产和分配，这一过程不断地再生产着分层。这种分层在工作组织和性关系中最为明显。

虽然干部不容易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以金钱犒劳自己，但他们有机会利用自己的权力逃避体力劳动，或通过给农民分配艰苦的工作来惩罚他们。当生产队干部去开会或只是在田间闲逛时，他们仍然声称在工作；这造成了农民和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在西流村，一个生产队长没有参加工作，但声称自己干了很多或。记分员没有分配工分，而是讽刺地写下了“他一会飞到西，一会飞到东，啥都没干。”⁴⁰ 此外，不同难度的任务有时会被赋予相同的工分，因此，干部可以将艰苦的工作分配给他们不喜欢的人，据我的受访者说，这种做法并不少见。在一些故事中，人们试图通过贿赂干部来获得更好的工作任务，并在其他方面得到“更多考虑”，包括但不限于城市和军队工作的推荐信。

对干部的奖励也采取了性关系的形式。1983年初春，西流村一位女农民的突然死亡成为松滋市人们的谈资。杨传荣的尸体被发现在一个小池塘里。警方很快宣布，杨传荣的死亡是一场意外，不是谋杀。这一声明受到了村领导的欢迎，包括杨传荣的丈夫周先银，他是该村的党委书记。然而，这一声明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警方被迫进行

了另一次调查，但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抗议一直持续到第四次调查，当时警察最终得出结论，是周先银本人下令另一个农民杀害了他的妻子。他长期以来一直在策划这起谋杀案，以便他能够与另一名做了七年情妇的村妇结婚。⁴¹ 不久之后，周先银被判处死刑。他不是一个小黑社会老大：事实上，多年来他一直被认为是农村集体的模范干部。但他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和他的盟友三度成功操纵了调查结果。显然，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并不和谐。

通过性关系表现出来的分层显然不只限于松滋。威廉·韩丁（William Hinton）在其经典著作《翻身》中指出，1948年，腐败的干部滥用职权，与村里的妇女发生不正当关系。⁴² 当韩丁重访张庄时，类似的故事在二十年后重现。⁴³ 这些不正当关系的基础很清楚。男性干部之所以能够拥有情妇，是因为他们对当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工作分配和向负债家庭提供贷款的权力，从村里的妇女那里获取性好处。从1960年代开始，城市学生被从学校“下放”到农村体验体力劳动。为了回城继续学习，他们需要农村干部的推荐信，这为干部的滥用职权创造了更多机会。

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历史条件，不可能轻易改变。例如，在19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个外部监督工作组发现附近一个县的大队党委书记范某有问题：他向每个工作组收取贿赂，尽可能地逃避体力劳动，在分配决策中表现出偏袒。监督小组认为应该撤换樊。但樊网告他们，没有他，大队就无法运作。工作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评估了情况，并做出了新的决定。在找到另一个合适的领导人之

前，樊将留在他的位置上。虽然樊被降职了一阵子，但一年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据我采访的工作小组成员说，樊是该村为数不多的受过教育的人之一；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善于演讲，所以在村里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替代者。⁴⁴

另一个故事起源于附近的一个县，但它有助于说明总体情况。1960年代初的一天，一个生产大队长突然要求一个男农民去村外的建筑项目干活；这个农民及时收拾行李，开始了他的旅程。出发前，他的妻子几次要求他留在家里，但都没有说服他。在路上，他一直在想妻子的奇怪行为，最后决定回去看看她是否还好。当他回来时，他发现他家的门从里面反锁了。他从后窗进入屋子，发现大队长和他的妻子躺在床上。那个愤怒的农民逮捕了大队长，并将他送到公社一级接受惩罚。然而，公社领导只是训斥了大队长一顿，就让他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公社领导的解释是，这个人是该大队唯一有能力管理生产的人，所以解雇他将给实现生产目标带来严重问题。⁴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成为可能。政治分层受到了挑战，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⁴⁶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杨担任了20年的生产队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反对者批评他对群众的脾气不好。他曾两次因遭到反对而下台，但两次都被要求在三个月内复职。没有其他人在组织生产方面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他的反对者在上任后根本无法推动工作的开展。还有一次，公社领导人被要求参加一个会议，期间群众可以自由批评领导人。会议持续了两天，领导人不得不从早到晚一直站着。然而，在所有严厉的批评之后，反对

派的领导人来到台上，骄傲地宣布：“现在，革命会议已经结束了。让那些老领导（the older leaders）继续负责正常的事务吧！”⁴⁷

韩东屏指出，在他的家乡，文化大革命极大地赋予了农民权力。⁴⁸但这可能并非普遍的情况。确实有反对分层的斗争，但现状并没有明显改变。维持民主需要更多的根本性变化，而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完成的。

有利于积累的政策

许多农民认为，集体经济下的生活质量很差。⁴⁹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与现在普通农民的物质生活相比。我们谈论的不是现代消费品，而是低水平的基本生活，例如，每年的肉类和大米消费。没有关于松滋农村个人消费的详细数据，但全国性的数据表明总体上改善缓慢：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 1955 年的约 186 公斤略微增加到 1978 年的 193 公斤，而猪肉消费从 4.19 公斤增加到 6.37 公斤，食用油从 1.72 公斤下降到 1.05 公斤。⁵⁰

贫困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产量（尤其是粮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例如，1949 年，松滋市的粮食总产量为 134,160 吨，总人口为 490,827 人；到 1979 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到 308,640 吨（增长 130%），但人口也增加到 813,824。⁵¹人均粮食供应量从 273.5 公斤增加到 379 公斤，在 30 年内提高了近 40%。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仍然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因为 1949 年的起点是处于饥饿的边缘。

虽然人口的增长减缓了人均消费的改善，但需要正确看待这种增长。从 1928 年到 1949 年，松滋的人口只增加了 0.4%，即大约增加了 2000 人。⁵² 极端贫困、无休止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都导致了人口增长的缓慢。1949 年后，随着农村集体开始覆盖医疗保健和基本需求，除了大饥荒的悲剧例外，人口稳步增长。

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国家政策倾向于快速工业化。这种支持积累的政策两个方面是与农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直接相关：劳动积累和个人债务。

第一个方面是毛泽东的劳动积累计划，它总体上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⁵³ 这些计划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积累手段，对松滋人民产生了持久的积极影响，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所经历的财政限制而言。⁵⁴ 松滋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在集体时代经历了大量自筹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劳动力往往来自当地的农村集体；根据我的访谈，一个普通农民在这些外部项目上的平均劳动时间是每年一个月。县政府提供的唯一补偿是粮食，这是从农村集体中采购的。劳动者还可以从建筑工程中获得工分，在年终时计入他们的集体产出份额。但是，由于建筑工程往往不能立即增加集体的产出，这种机制实际上要求农村集体对项目进行补贴，而且并不总是带来预期的生活质量改善。

第二个方面是集体中普遍存在的负债现象。事实上，在访谈和其他历史叙述中，“欠集体的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农村集体中的一些家庭，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摆脱债务。⁵⁵ 在新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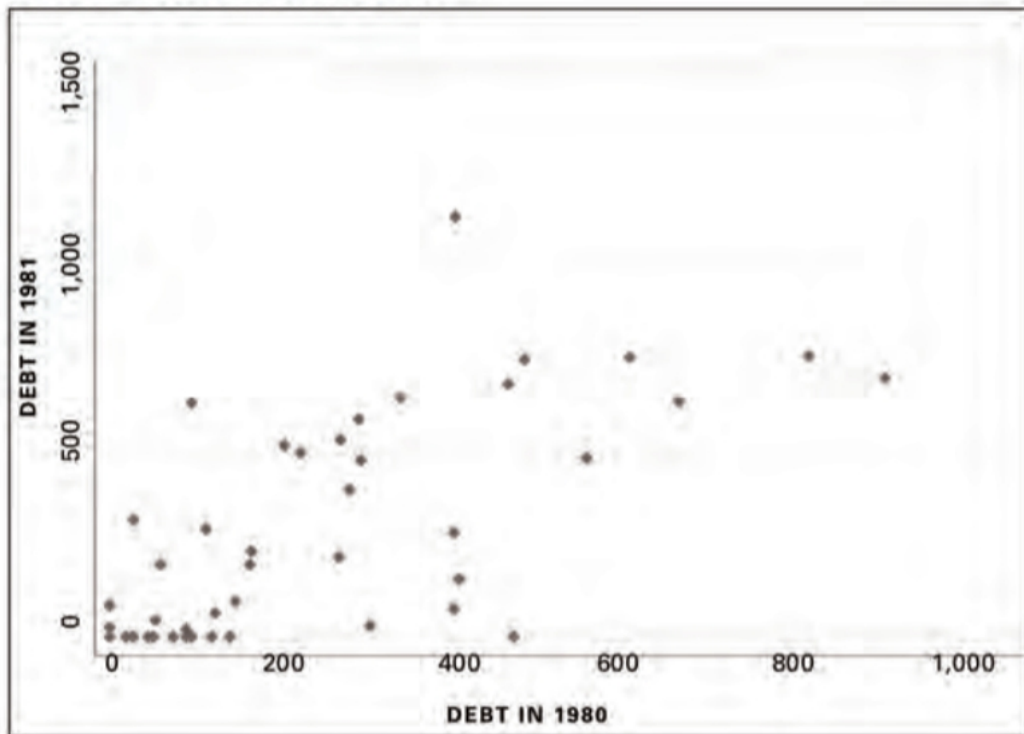
道和支持去集体化的小说中，故事往往是这样的：“有一个极其贫穷的生产队，每家每户都负债累累，但在分田单干后，一两年内他们就还清了债务！”虽然集体化时代的大部分队级账目在去集体化后被丢弃，但一些地方干部仍在家中保留了记录。我们在此分析的记录来自1981年八宝公社永吉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当时正值去集体化前夕。

该队由六十三户人家组成，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1980年就已经欠了队里的债。经过一整年的工作，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仍然负债累累。根据采访，这支生产队的债务问题肯定不是该公社最严重的。当时

（1981年底）每户的（累计）平均债务是720元；1981年每户的平均分配只有615元。因此，一整年的工作还不足以偿还家庭的平均债务。

仔细观察家庭数据就会发现，债务的负担并不是平均分摊的。1980年负债的人有可能在第二年再次负债，而没有负债的人也有可能于1981年摆脱了债务。从图5.1（下图）可以看出债务的持久性，该图将1981年的最终债务与1980年的最终债务作了对比。尽管1981年负债家庭的绝对数量从四十一户减少到三十三户，但每户的有效债务（总债务除以负债人数）实际上从265元增加到416元（增加57%）。同时，每户的有效分配为225元；因此，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巨大的。这一分析表明，生产队中的一部分人深陷债务泥潭。这也意味着，这些集体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平均主义。这证实了人们的怀疑，即任何一个生产队中的家庭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FIGURE 5.1: Household Debt



这些债务是怎么来的？在这一年里，农民通过劳动来获得工分。年底时，集体计算其产品（农业和工业）的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和各种积累后，剩下的部分按每个劳动者在这一年中积累的工分比例分配。在这一年里，也有预先分配给家庭的口粮。农民有时也需要现金，所以他们向集体借钱。一旦农民在年底收到集体的分配，他们就会还清粮食和现金贷款的债务。然而，如上所述，许多农民的年度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其结果是欠下了集体的债务。

债务问题是由两个相关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首先，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并不有利于农业。虽然在集体时代，一些工业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但大多数农产品的采购价格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以促进积累。农产品的价格没有固定或下降，但在集体时代，总体上

只有适度的增长。以大米为例：1965-1978 年间，松滋市的采购价格每年仅增长 0.9%。⁵⁷ 此外，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始终慢于工业，这使农产品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在他们非常有限的收入中，农村集体必须支付各种支出，包括医疗、资本投资和所有成员的基本需求。这进一步限制了可用于消费的资源。回到永久大队的账户，我们看到，1981 年，永久大队的总收入为 77229.51 元。这笔收入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生产成本（肥料、种子、机器、税收等）；另一部分用于公益金和公积金。这些费用共计 31410.61 元，剩下 39915.37 元用于按照社员的工分进行分配。然而，实际分配的总额是 42689.97 元，因为这是农民需要的消费总额。这意味着在该队前几年积累的债务上又增加了 2774.6 元的新债。

对于一个试图建立自己的现代工业的穷国来说，持续的负债并不奇怪，因为它只能从自己身上提取剩余。保罗·巴兰（Paul Baran）已经预见到，在一个进步经济的早期阶段，大众消费的增长应该非常缓慢，如果有的话。事实上，对农民来说，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随时向集体借钱，不用利息。⁵⁸ 此外，在我的访谈中，没有一个老农民对支持积累的政策表示不满，而是倾向于认为自己与产业工人是同盟关系。⁵⁸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需要在农业的支持下建立自己的工业。一旦工业强大起来，工业就可以用其技术和资本支持农业，两者都会得到发展。

故事的另一面是集体内部存在着收入差异，这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直接冲突。事实上，正如 Whyte 所观察到的，中国的平均主义在意识

形态层面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减少收入差距的层面上则不然。⁵⁹然而，这可能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集体统治下的收入分配肯定比民国时期要平等得多。⁶⁰此外，家庭收入还受到劳动力和家属数量的影响。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可能有很多人要养活。因此，家庭收入的差异不一定会转化为高度的不平等。

集体内部的不平等也来自其他方面。例如，集体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人均土地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造成的，这很大程度上是革命和土改的遗留问题。⁶¹1960年代初，随着生产队成为基本的核算单位，队与队之间的再分配非常有限，这就造成了队、大队和公社之间的差异。Vermeer 同样注意到，经济核算单位的规模也对不平等产生了重大影响。⁶²

去集体化

1980年代初，流传着关于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传言。后来证实，家庭生产是中央领导青睐的新模式。事实上，早在1980年，一些村庄就已经在上级的命令下采用了家庭农业。⁶³1981年，全国层面去集体化的设计师杜润生与所有部长一起参加了国务院会议，提出了改革集体的想法。⁶⁴在对农村集体的批评中，杜润生强调，现有的集体并不是真正的平均主义。一方面，一些特权集团占有不公平的剩余份额；另一方面，31%的家庭负债累累。杜的谈话似乎受到了高层领导的欢迎，副总理薄一波立即评论说：“这也是剥削！”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显然是为了宣布即将到来的去集体化而组织的，在

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有趣的是，政客们实际上将分层而不是“平均主义”视为核心问题。但他们开出的药方只是解散集体。

1982年底，县政府向各公社、大队、小队下达了去集体化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刻，很多农民简直一头雾水。⁶⁵ 在我的采访中，许多农民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觉得共产党选择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解散了集体，恢复了小生产者经济。这里面既有实际问题，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在那些机械化已经很发达、生活质量相对较高的公社，人们强烈反对去集体化。类似的敌视态度也可以在男劳动力很少的家庭中找到。⁶⁶ 一位农民解释了他的生产队为什么对新政策抱有敌意：“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劳动分工：有些人只开车，有些人只种地，有些人负责生产车间，这样效果很好。在解散集体之后，每个人都必须种地，而我们很多人却对此一无所知。”⁶⁷ 另一位农民分享了他的经历：“当时我已经在另一个村子里工作，专门从事渔业。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在去集体化之后，我老婆一个人管不了这些土地，所以我不得不回到村里继续种地。”⁶⁸

当然，也有一些人赞成体制改革，包括有大量劳动力可供利用的家庭或功能失调的集体。⁶⁹ 对于那些遭受分层之苦的人来说，去集体化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甚至有农民对去集体化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不必像在集体中那样辛苦工作”！⁷⁰ 认为去集体化可以治疗分层的痛苦的幻想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反映在各种流行的文学作品中。1981年，何士光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乡场上》（on the ground）。主要内容是，一旦你得罪了一个干部，你就得罪了村里的

整个精英阶层，这将立即为你从商店购买基本商品或从干部那里获得补贴食品（当时的稀缺资源）带来麻烦。整个村子似乎是由一小撮人拥有和管理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那么，什么能拯救农民呢？主人公解释说。“我以前穷得无法——我没有办法呀！脸是尽了。但现在不同了，我现在自己种了一块地，现在我能够很好地养活我的家人。我不需要你的任何食品补贴，你也不能再对我指手画脚了。”换句话说，去集体化等于政治赋权。⁷¹

农民中还有另一种态度：漠不关心。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关心意识形态。他们每天在集体中所做的是为了挣工分，而在去集体化后则为了赚钱。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集体虽然并不完美，但还行；家庭模式将是不确定的东西，可能会演变成资本主义，但为什么要费力抵抗？如果政策改变，他们可以接受。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制度变迁将是完全外生的东西。一位前干部对他所在的大队中不同态度的相对比例作了这样的估计：超过 30%的人反对去集体化，不到 30%的人支持去集体化，剩下的 40%对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所谓。⁷²

也许“无所谓”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因为无论农民怎么想，1982年底松滋的上层干部都把去集体化强加给他们。农民和干部们把这场运动形容为一场“风”，风过之后就没有集体了。许多地方干部很难说服自己同意非集体化。一位老干部回忆说，有一天，他和其他农村领导被召集到县政府，接受一些培训，了解去集体化的重要性。培训结束后，每个人都被要求发誓理解新政策并将立即执行。⁷³

可以说，松滋非集体化的最终原因是国家政策的改变，这引起了农民的复杂反应，这取决于他们集体的相对发展水平。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这与十年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反应不同。这表明，去集体化确实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农民。这种吸引力是什么？分层是绩效不佳的根源，也是集体时代农民抱怨的焦点。非集体化似乎能够通过摧毁集体来摧毁分层。这可能是大多数农民没有强烈反对就接受新政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因为政府提高了他们的农产品的价格，这可能也有助于农民对新政策的信任。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其他因素如宣传工作也发挥了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去集体化是解决分层的真正办法吗？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指出的，分层并不取决于集体结构本身。事实上，如果社会主义的因素仍然对分层有一些限制，至少在收入分配方面是如此，那么以后就不会有这种限制了。在周先银杀妻的西流村，集体企业、橘子园和茶园在周先银手下一度经营良好。一位农民评论说：“周先银从来没拿过一分钱公款。”⁷⁴ 然而，这些集体企业在去集体化后全部破产，只有新贵们受益。村民们都觉得不可能继续进行集体项目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管它们。⁷⁵ 1990年代末，党委书记以惊人的低价将大片农田出租给一些外部公司。当农民迫使他下台时，他立即在这些公司中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⁷⁶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农民从集体企业中获得的投资和社会支持在去集体化后被严重削弱。⁷⁷ 尽管弗里德曼等人对农村集体持批评态度，但他们承认，后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好转的迹象”。

在集体体制下，“特权阶层垄断了物质特权”，而在后集体时代，“炫耀财富”。⁷⁸在十多年的不满之后，乌坎村的起义说明，去集体化实际上剥夺了农民的权力，并允许更大、更明显的分层。⁷⁹

后记

1980年代中国乡村的政治和经济巨变是众多斗争的前奏，最终诞生了当代中国社会。集体看似和谐的结局和随后的输出刺激，为后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从理论上讲，中国去集体化的成功故事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部分基础。新自由主义学说认为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是人类社会繁荣的处方。主流意识形态也认为去集体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总体上是自发的基层运动。这条线索或明或暗地嵌入了大多数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当代著作中。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批判性地审视了中国的农业变革。基于定量和定性的证据，我表明，去集体化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集体的效率低下，也没有导致更高效的农业。这场运动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而不是自发的和基于基层的。在揭穿了这个神话之后，我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精英们必须解散集体，以追求一条亲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去集体化则是破解毛主义体系的第一步。这并不是说毛主义集体是完美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后的案例研究着重于集体内部的矛盾这有助于解释像去集体化这样可能不受欢迎的改革并没有遭到集体成员的反对这一难题。

过去十年，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活动家圈子里，明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了三年经济学。我经常把去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纳入我的教学大纲。学生们喜欢听马克思主义（和不同的）对去集体化和中国广泛的社会变革的解释。我的感觉是，官方对去集体化的宣传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了。我认为这表明中国青年对中国社会主义过去和资本主义现在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出现了新一代的激进学者，包括老田和溇水农夫，他们在主要的左派网站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农业改革的批评文章。一个以活动家和学者为基础的热门网站“人民食物主权”

(www.shiwuzq.com) 也发表了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变革的重要批判文章。

毕竟，农村劳动人民除了在纸面上赞扬他们在拆毁社会主义方面的“主动性”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劳动

人民获得了什么。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有趣的时期，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自己的系统性危机，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当然，问题是，怎么办？

现在很明显，传统的农民问题将逐渐消失，工人问题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当前的中国政权鼓励土地合并和农村土地的进一步私有化。通过保留小家庭生产来为农民工维持一个安全网络的努力，使这一趋势变得复杂。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并将继续主宰中国农村。那里没有明显的封建关系出现，传统的农民问题（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不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人（旧城市工人、新农民工和农村工人）与工业和农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进步经济计划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通过把农民组织到农民协会和合作社中，（重新）赋予农民权力。去集体化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大大失去了权力。这可以帮助减少中间商和大资本的剥削，阻止数百万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

第二，在经济和政治上重建工农联盟。20世纪的教训之一是农民和工人没有团结起来反抗新自由主义。统治阶级利用这一点，让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竞争，以加强纪律和降低工资。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工农联盟就不会再分崩离析。这样，任何对农民的祝福（例如更高的粮食收购价）都不会变成对工人的诅咒（更高的生活成本）。目前工农双方仍在为不同的问题而斗争，但到时候，两者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政治合作。

第三，资本监管至关重要。新自由主义时代赋予了资本跨越国

界以获得更大利润的自由，也赋予了工人阶级竞相逐底竞争的自由。如果要实施亲工农政策，严格控制资本流动将是一个必要条件，这样资本家就不能像新自由主义时代那样轻易逃避责任。

关于建设和维护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本书中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Alain Badiou 说我们仍然是五月风暴的同时代人。他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上一代人还没有完全解决上一波革命实验所产生的问题。任何未来的社会主义项目都必须重新审视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资产阶级试图回到革命前的阶段是徒劳无功的，实际上没有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世界工人阶级不能浪费更多时间了。关于资本主义。是时候再次提出这些问题了。

